

意大利六七十年代的阶级斗争与理论探索

无产阶级闹天宫

(上)

La classe operaia va in paradiso

目 录

工人而非那些外人或许就会有最终决定权

拉尔夫·鲁库斯采访费鲁乔·甘比诺 (1)

意大利工人主义年表

圭多·博里奥 (21)

机器的资本主义运用 (1961)

拉涅罗·潘齐耶里 (41)

菲亚特铸造厂的野猫斗争（1964）	
罗马诺·阿尔科蒂	（71）
列宁在英格兰（1964）	
马里奥·特龙蒂	（97）
编后记	（112）

工人而非那些外人或许就会有
最终决定权

拉尔夫·鲁库斯采访费鲁乔·甘比诺

The workers may have the last word, not
those who are on the outside

Interview with Ferruccio Gambino by Ralf Ruckus

2018 年 4 月，意大利帕多瓦。

拉尔夫·鲁库斯：工人主义源于什么？

费鲁乔·甘比诺：工人主义源于一个工业化动力强劲（尤其是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时代中变更社会关系的冲动。这种冲动可以被归结为：那些每日出卖生命来换取工资的人，必须拥有更好的生活方式。

鲁：1950年代哪些社会和政治变动造成了工人主义的新理念？

甘：工业化、移民，以及不仅城市而且几乎意大利各地工作生活节奏的加快。

1947年，意大利共产党和社会党被踢出了受美国资金和外交支持的战后反法西斯政府。最终成立的政府是由大保守派政党和一些小的世俗政党（法西斯党除外）组成的联盟。它试图使意大利成为一个工业国，并改变以北方垄

断工业家和南方地主组成的联盟为中心的旧秩序。它通过管控从乡村向城市的移民，严格控制工资和劳动供给。

这些管束遭到移民们的强烈抵抗，他们用脚投票，离开了农田中糟糕的工作。到 1950 年代，以城乡分离为基础的旧社会秩序开始瓦解。1955—1975 年间，一半意大利人（即五千万人中的二千五百万人）改变了自己的居所。

从北部农村、意大利中部乃至意大利南部向（尤其是意大利西北部的）城市郊区的移民浪潮是一条不会回流的河。此外在 1940 年代末，意大利政府曾满怀一去不复返的希望，鼓励年轻人移民南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也有向比利时煤矿的合法移民，并且 1954 年后向德国的合法移民也大踏步前行。还有向法国、瑞士和英国的合法与地下移民。到 1950 年代末，当意大利城镇的工业化势头强劲时，许多欧洲的意大利移民纷纷回国。回到意大利后，他们往往会要求获得与其在中欧类似的、更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水平。

1947 年后，对政府政策的反抗围绕着意共和社会党展开。这些活跃于 1950 年代工业城镇中的党，比其敌对的保守派政党更善于管理城镇。即便如此，移民实在太多，以至新来的人不得不自己照料自己。许多年轻人不知道去哪儿寻求帮助。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到 1950 年代中后期，

人们的不满开始增长。但在当时，这种不满还没有名称。

鲁：你能给我们进一步讲讲意共的政治危机吗？谁以及为何对意共不满？

甘：在工业领域获得新工作的年轻人寻求自卫，并发现在一定程度上，从左翼政党、左翼工会联盟（意大利总工会）和中间派的天主教会联盟（意大利劳动人民工会联合会）那里所获甚少。但是，左翼的总工会所能提供的比温和派的意劳联还要少，因为产业家从1940年代末起，就开始采取强硬的反左立场。

此外在1956年苏联镇压匈牙利暴动后，一部分青年学生无法接受加入意共。一小部分被1950年代两大左翼政党（意共和社会党）孤立的异见马克思主义者，在例如罗马、米兰、热那亚、佛罗伦萨、帕多瓦以及尤其都灵这样的城市中，引起了青年工人和学生的一些注意。

在一些城市中，还有一些小的异见团体。甚至国际主义共产党（1920年代与意共的葛兰西路线分道扬镳）的老波尔迪加主义者也从法西斯主义时代幸存下来了，并将他们的经验传给年轻的独立左翼分子，例如达尼洛·蒙塔尔迪（Danilo Montaldi）和罗马诺·阿尔科蒂。

鲁：拉涅罗·潘齐耶里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甘：在 1950 年代末 1960 年代初的这段酝酿时期，潘齐耶里是一位能将人们凝聚起来的人物。1940 年代中期，作为罗马年轻的社会党党员，他去往西西里的墨西拿大学教授哲学，同时组织政治和文化活动，并在 1950 年领导那里的农民夺占土地。那次没收流亡地主土地的夺地经历，对他的生活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1950 年代初，他晋升担任社会党领导层的重要职位。当社会党右转（1959—1962 年）并加入政府联盟后，他定居都灵，为一家出版社工作，拉开了自己与社会党的距离。作为一位不倦的组织家，他将全国各地从社会党、意共分裂出来的各种左翼青年异见团体和小团体联络起来，并使他们为崭新的事业做好准备。

鲁：他活动的结果之一是《红色手册》（Quaderni Rossi）杂志。

甘：这可能是他主要的成果：将分散的年轻人集合起来，给他们超越当时政治建制的动力和勇气，发行了开拓性的

刊物《红色手册》。第一期出版于 1961 年。头三期的标题异常明确地表明，他们试图更新工人阶级的视野：“资本主义发展内的工人阶级斗争”“工厂与社会”“资本主义计划与工人阶级”。

《红色手册》战士是一个成分混杂的团体。其中一些人（包括潘齐耶里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在社会党接受了自己的政治训练，其他一些人（例如马里奥·特龙蒂）曾是意共党员，此外还有一些人，或者像阿尔科蒂一样来自左翼小团体，或者像维托里奥·列塞尔（Vittorio Rieser）一样来自总工会。

在这个团体中，工厂工人是为极少数，尽管为《红色手册》工作的人与大小工业领域的工作场所有着各种联系。他们总共大概也不过六十人，虽然其中大部分为男性，但像安娜·基科（Anna Chicco）、莫妮卡·布鲁纳托（Monica Brunatto）和利利娅纳·兰扎尔多（Liliana Lanzardo）这样的妇女活动家曾做出重要贡献。

鲁：你是什么时候并如何参与这些论战和组织工作的？

甘：一切都始于 1956 年末。当时我的一个朋友和我还是一座西北小城高中十五岁的学生，正考虑加入当地的意共。

然后匈牙利暴动爆发并被击垮了，这使我们质疑：加入一个跟那些向工人开枪的人联系紧密的党，有什么意义？

1960年6月，高中刚毕业，我就去了米兰，并且不得不上班以维持大学生计。我白天上课，晚上上班，先是在一个办公室，然后打一些零工，做家教、做翻译。我夏天也工作，并且农忙时如有必要，也下田帮我爸爸。

1960年后，我和已经搬到都灵的朋友联系。他告诉我有一个名叫“红色手册”的新团体。我开始读他们的材料，觉得它很有意思。

鲁：你觉得，《红色手册》最重要的贡献有哪些？

甘：对于这一点，我必须直截了当地说一说，即便可能过于简化。首先是主体性。历史学家于尔根·库琴斯基（Jürgen Kuczynski）在《工人阶级的兴起》最后一页中写道：“……如果不是作者同情这个阶级的话，就不会有关于还没遭遇过知识海难的工人阶级的兴起和状况的著作。”阿尔科蒂在这一点上走得更远：如果不和被压迫者与被剥削者并肩战斗，就不可能了解阶级社会中人的状况。这就是他所谓“合作研究”（conricerca）的源头。^[1]

其次，随着工厂扩张，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切社会关

系都日益受到工厂的塑造。马里奥·特龙蒂进一步指出，我们之前是首先观察资本主义发展，然后再是工人阶级斗争。他认为，这是错误的，必须把问题上下颠倒过来。首先应该是工人阶级斗争。^[2]

第三，潘齐耶里和列塞尔提出，被制服的阶级冲突经过消化吸收，变成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工具。

最后，潘齐耶里曾提出，机器和技术创新的资本运用不是造成进步的中立演化，而是剥削和征用工人阶级的精致工具。^[3]

1960年代初，伴随欧洲迷人的经济增长，他们的话听起来与主流常识相悖。即便现在，似乎很多国际左翼也并未接受这些观点。

鲁：1963年《红色手册》分裂了。分裂的原因是什么？

甘：那次分裂由来已久。都灵的潘齐耶里和他周围大部分的人，都希望战士们能深化经验，并在以新的政治活动团体和更为充分地准备重装上阵之前，花上一段时间仔细研究工人阶级状况。

1962年7月7—9日反对黄色工会背着工人签订劳动协议的野猫罢工，是划过意大利政治黑夜的闪电。那时正在

成为一座百万人口城市的都灵，被菲亚特汽车工厂控制着。1962年，这座城市又一次变成了社会冲突之所在。

必须指出的是，这次反叛不仅被《红色手册》预料到了，而且得到了都灵“红色手册”战士的推动。反叛之前和之中，战士们在工厂门外广泛散发《红色手册》的传单。左翼工会和意共斥责《红色手册》是被另一边收买的坐探。这种指控没过多久便反过来针对意共了，因为大部分左翼人士明白，潘齐耶里和他年轻的同志们是诚实而富有献身精神的人。

随后，《红色手册》大概有一半人（包括潘齐耶里和列塞尔）将自己的活动主要限于研究。另一半人（包括特龙蒂、奈格里和阿尔科蒂）则决定开办新的战斗性刊物《工人阶级》（Classe Operaia）。^[4]

分裂后，两个团体之间鲜有仇怨，继续保持着联系，并且直到1964年都还有重新统一的可能。1964年10月潘齐耶里突然去世，享年四十三岁。1965年《红色手册》出版了第五期，然后这份刊物就再也没有继续下去了。

鲁：分裂时你在做什么？

甘：1963年末，都灵的朋友告诉我说，威尼托大区的那些

人要分裂，其他一些城市要离开《红色手册》。我订了他们的新杂志《工人阶级》。当收到第一期《列宁在英格兰》时，我的思想遭到了实实在在的震动。特龙蒂写道，我们很长一段时间是首先观察资本，然后再观察工人阶级斗争，而我们错了。他论述道，我们必须把问题上下颠倒过来。我的头脑开始翻滚。我们这一小群感兴趣的学生一再阅读《列宁在英格兰》，对它做出评论，并且没有太过注意到这样的看法：一种革命性的矛盾对立必须来到列宁主义羽翼下的西方。文章不断地谈论革命性变革的潜在动力，谈论在两次大战的纸牌戏中出局、但重又恢复生机的工人阶级（虽然在欧洲创造了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统治阶级想彻底消灭它的政治力量）。

我想跟《工人阶级》的人联系，我找到的第一个人是塞尔焦·博洛尼亚。^[5]他的住所离我待的米兰学生宿舍（一栋住了六百名可能城里最穷学生的楼）很近。我为《工人阶级》组织的第一次会议是1965年在那儿跟一些学生开的会。后来由于我获得富布赖特基金，可以去美国学习，工作就中断了。我1966年9月去了纽约。那时的纽约比意大利更能使我激进化。1967年春，我和五十万人在纽约游行——在马丁·路德·金的领导下——反对越南战争。那是令人难忘的。后来在1967年，我回到了意大利。

鲁：《工人阶级》周围的团体有多大？

甘：《工人阶级》是一本 1964—1966 年间发行的刊物，参与其中的总共不到百人（没有算上意大利东北部），其中大部分出生于 1920 或 1930 年代，除了圭多·比安基尼（Guido Bianchini）和卢恰诺·阿里盖蒂（Luciano Arrighetti）。这两位重要的老同志曾参加抵抗运动的游击队，并在战后仍然长久地坚持战斗。1966 年初，它是一个虽然小却活跃于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大城市和小工业区的团体。到那时，威尼托（意大利东北部）的《工人阶级》团体发展壮大，已经有五十多名训练有素的战士了，包括许多产业工人。他们开始称自己的团体为“工人力量，工人阶级威尼托分部”。

不过它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团体。它的大部分领导人（包括从来没有和意共完全断绝关系的《工人阶级》总编马里奥·特龙蒂）在罗马。当意共在 1966 年铆紧螺丝时，马里奥·特龙蒂和他手下在罗马的一些战士决定让刊物和团体永远关张大吉。之后，此前因参与编辑《工人阶级》而被中止意共党籍的马里奥·特龙蒂完全重新融入了意共。

正是在那时，那些希望继续组织工作的人重组为“工人力量”。那些不愿放弃的人创造这个团体是出于必需。

鲁：你也参与过“工人力量”，尽管在某些方面你不赞同它的一些观点。

甘：对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来讲，在“工人力量”的1969和1970年是忙碌而充实的年份。这段时间充满了政治活动。对我和其他一些人来讲，最困难的时期是在1971年“工人力量”转向列宁主义之后。

向列宁主义转向比较早的标志是《工人力量》第三期的一篇标题不祥的文章：《从说列宁开始》（Cominciamo a dire Lenin）。包括我在内相当多的人，与布尔什维克格格不入。而我们却和那些试图利用列宁主义缩减组织工作的人待在一起。

对那些曾采用过合作研究方法的人来讲，关键是自上而下地建立一个组织。在列宁主义看来，所谓“阶级意识”（那时我们没能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这个术语，因为它就不在那儿）必须由知识分子自上而下地灌输入工人阶级当中。这是对合作研究的颠倒，扭曲了那些转变了组织方针的团体其成员的最终行动路线。

虽然这些政治分歧日益加剧，我仍然待在“工人力量”中，因为我觉得这种情况会得到扭转（或许通过一次分裂）。后来在 1973 年夏，发生了分裂，那时我们中的一些人在工业中心（例如我当时仍然活动的威尼斯附近的马尔盖拉港）的几个工人委员会当中退缩了。

同时，出现了两个关键性的发展。一个是由“工人力量”成员（包括玛丽亚罗莎·达拉·科斯塔）在内部发起的女性主义运动。她和其他一些“女性主义斗争”（Lotta Femminista）的创建者从 1968 年起就在“工人力量”中活动。她们和其他意大利国内外女性主义者的网络在那段时期得到了发展壮大。她们在“工人力量”中变得不那么活跃，大概到 1970 年就不再继续参与进来了。^[6]

第二个发展是其他热烈的国际活动的兴起。这些活动旨在联络法国、瑞士、德国和美国等地的大小团体，尤其“面对现实”、黑色革命工人和旅居者真理组织。个人来讲，我要永远感谢这三个团体促使我成型和成长。

随着 1970 年代中期不同列宁主义武装团体（例如红色旅）的扩散，随着 1977 年开始对“工人力量”成员的镇压和逮捕，我们的麻烦增多了。

我这里要补充一下：那些进行反对事物的鼓动、宣传和暴力的团体，与红色旅这样对人民采取暴力的团体之间，

存在重要差别。“工人力量”前领导人或者被监禁或者被迫流亡的原因在于，受意共鼓动的司法机关决定，使绝迹了的“工人力量”有罪化并且永远地消灭它，最好的办法是，宣称他们的组织还没有解体，并且其与红色旅的领导层有所重合。1983—1984年开始公审时，这种指控是荒谬且站不住脚的。但在同时，战士们已经或者遭受了严密的监禁或者流亡国外多年。

同时，“工人力量”实际上在1973年7—12月之间已经解体了。后来在罗马复兴它的尝试失败了。在意大利北部，一部分“工人力量”的战士和其他团体合并为“工人自治”（Autonomia Operaia）。

鲁：你能进一步谈谈与“工人力量”罗马分部的冲突吗？

甘：他们大部分是列宁主义者。其他主义的成员当时已经退出了。

在我看来，那些在罗马加入“工人力量”的人最初就形成了一个社会成分特殊的团体。虽然依靠一个北方工人阶级团体（例如早期的“工人力量”）的吸引力和战斗性，但基本来讲，它是一个对他们在罗马郊外捡来的工人仅有些许了解的学生团体。工人和这个团体的利益以及视野没

什么关系，更不要说它的列宁主义了。

总之，“工人力量”最重要的成果在于它树立了一个榜样。它证明，学生和工人相互之间可以平等地、在不仅涉及思想而且涉及行动的政治集体活动——这种政治集体活动也关涉社会技能发展，和一个如非敌视便是漠不关心的病态社会中的个人风险——的基础上互动。

团体内的政治分歧是明显且公开的，哪一方也不准备妥协。论战是热烈的，但也相互尊重。真正的考验在 1970 年代末和 1980 年代初来到了，双方之间的团结在监狱和流亡中没有减弱。

鲁：工人主义提供的一种不同于列宁主义的方法是“合作研究”。谁开始使用这个术语的？

甘：阿尔科蒂首先使用它的。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是阿尔科蒂早年导师之一蒙塔尔迪的概念。从某种角度来讲，一种共同性（commonality）开启了这种对待工人阶级状况的新方法：工人和知识分子战士能应对挑战，能不分高下，并且能努力相互帮助。双方都是政治努力的一部分，谁也不会去压倒谁。只要工人的状况被关注，工人（而非那些外人）或许就会有最终决定权，但却是在公开讨论的条

件下。

阿尔科蒂认为，并不存在会自上而下递减的才智。我们不必去教授什么东西，在说话前，我们必须深入研究状况。即便在阿尔科蒂研究工作状况的方式中，你也能看到那样的态度。他研读了所有有关时间—运动研究、生产技术（换言之，老板的工具）的书籍。当一名战士在处理复杂的状况时，他 / 她必须搜索一切边边角角。

鲁：是的，你参加一场斗争或者希望了解工人的状况，不是因为你想告诉他们一些东西，而是因为做出评论之前，你首先要倾听、观察和了解。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于，合作研究不是寻常意义上仅仅去了解一种状况的研究，而是特别地专注于变革事物的研究。我想，这个方面是重要的，因为如今一些人利用“合作研究”这个概念和术语只是去从事科学或研究，甚至在此之上建立他们的学术事业。但这不是初衷。它应该被看成一种组织、自组织和干预斗争的形式。

甘：我完全同意。

鲁：让我们来谈谈 1950—60 年代的意大利与当代中国的相

同和差异吧。这两个国家都经历了工业化、移民以及随后的工人斗争。

甘：一个大问题是，大部分人口脱离农村，旧有的农村经济解体了。在意大利，有那样众多的人口——至少相对于意大利人口来讲是众多的——从乡村去往城市。人们只提着硬纸板行李箱，便坐上火车来到了北方，追求更高的工资——或者甚至任何一种合理的工资。几个世纪的剥削和压迫终于走上了公共舞台。他们有自己的尊严，他们要求得到承认。

鲁：在中国可以看到的是，移民工人带着简单的包裹，坐火车往返东部或南部的工业区。

你曾说 1960 年代意大利斗争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二战后去往其他条件更好的欧洲国家的移民。当他们中的一部分回到意大利时，有着比那些待在意大利的人更高的要求，因为他们知道其他地方的条件怎么样。在中国，移民通常是在国内进行的，但是当移民回到他们的村庄时，那些待在村里的人看到你到城里能挣更多钱，许多人于是也移民了。

意大利移民工人的斗争看上去如何？

甘：1959—1962 年间是个转折点，因为当时在意大利最富裕的城市（包括米兰），一场真正的工人阶级运动正在兴起。工人开始说：我们创造了所有这些财富，但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我估计，这种态度多少也会影响中国。这或许需要数年时间，但那种四周堆满财富而自己所得甚少的感觉会造成惊人的结果。

鲁：我觉得我们已经处在这个阶段了。但有一点不同。意大利工人的状况确实改善了，虽然非常缓慢，并且被漫长的危机所打断。在中国，增长期很长，并且仍在继续。仅有一些相对来讲比较短的危机时期，对工人产生了一些影响，但显然没有影响到他们的愿景。

我们已经讨论过：工人主义的一个发现就是按照正确的顺序归置事物。面对那些分析资本然后再分析工人阶级的人，工人主义者说道：先看工人阶级！在中国，工人阶级当然是发展的动力。

中国要追求“更先进的”经济，就必须提高国内消费。这意味着，雇主需要将工资提高到一定程度，以使人们确实能够购买更多商品。这也是许多工人的要求。并且正如你所言，他们看到了财富，并且想要更大份额。

这是否将在中国造成一种革命状况或者造成与1960和1970年代意大利类似的工人运动，我们拭目以待。

朱 剑 译

[注释]

[1] 阿尔科蒂的《菲亚特的斗争》收入《无产阶级闹天宫》(上)。

[2] 特龙蒂的《列宁在英格兰》收入《无产阶级闹天宫》(上)。

[3] 潘齐耶里的《机器的资本主义运用》收入《无产阶级闹天宫》(上)。

[4] 奈格里的《计划国家的危机》收入《无产阶级闹天宫》(下)。

[5] 博洛尼亚的《作为历史范畴的工厂—社会关系》收入《无产阶级闹天宫》(下)。

[6] 达拉·科斯塔的《妇女与社会翻转》及西尔维娅·费德里奇的《反抗家务劳动的工资》收入《无产阶级闹天宫》(下)。

意大利工人主义年表

圭多·博里奥

Chronology: Operaismo in Italy

Guido Borio

2018 年。

1950—1960 年

意大利大工业开启了一个现代化周期，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激烈，出口翻番，国内需求大幅增长。许多大公司通过在工厂中引入半自动化全循环加工来创新生产方法。这种技术通过流水线生产，强化了劳动分工：这些流程可以将劳动力分解到多个简单任务中，大大提高速度和生产率。技术和组织变革在新资本主义的力量和工人阶级的构成方面产生了实质性的转变。这种权力关系是新定义的，其特点是高利润和低工资。

发展需要并导致了从农村到工业中心和城市的大规模移民——从南到北，从意大利到中欧国家。1952 至 1962 年之间的十年，多达一千五百七十二万四千人（大多数是活跃人口）从他们居住地城市的登记册中销户，其中一千五百六十二万一千人登记入其他城市。三分之一的意大利人改变了居住地、工作和习惯。社会、社会和制度体系迅速地发生变化，体现出了跨国公司与“大众工人”之间的

对立。

意大利工人主义在 60 年代初伴随着《红色手册》的活动而诞生。《红色手册》是一个以拉涅罗·潘齐耶里为中心开展活动的政治团体；它由都灵、热那亚、帕多瓦、米兰、佛罗伦萨和博洛尼亚的一小群战斗人士代表组成，他们为该杂志赋予了生命。《红色手册》第一期于 1961 年 9 月出版。在出版了六期之后，该杂志在 1965 年底休刊。

《红色手册》的战斗力表现在理论分析、调查、“合作研究”和政治干预。如潘齐耶里的《机器的资本主义运用》、阿尔科蒂的《奥利维蒂公司中的资本有机构成和劳动力》、特龙蒂的《资本的计划》等一系列作品和介入激发了大量争论。

1962 年

新一轮的斗争周期始于工人与公司的集体合同续约的问题上。都灵有九万三千名工人罢工，阻止汽车厂的生产。菲亚特（FIAT）公司以锁厂（lock-out）的方式做出回应，并与 UIL（“意大利劳工联盟”，一个与公司合作的工会联盟）签订单独的合同。7 月 7 日，大批年轻工人到法律广场的 UIL 总部，破坏总部大楼，并与警察发生冲突。随后，成千上万的工人逐渐涌入，冲突变成了反抗，持续了两天

之久，在此过程中示威者们得到了广泛的交流。

随着法律广场事件而来的争论界定了关于工人斗争模式的不同立场，以及关于《红色手册》团队的角色。这些不同的立场发表于米兰的《工人年表》(Cronache Operaie)和《工人的力量》(Potere Operaio)以及都灵的《野猫》(Gatto Selvaggio)。随着时间的推移，互相矛盾的立场深化了，最后导致《红色手册》团队的分裂。

1963年

7月，威尼斯市马格拉区的石油化工厂外举行了一场集会，要求增加薪水，罢工停产四十八个小时。

10月，菲亚特发生了重要的野猫罢工事件。在都灵，米兰和维内托的许多工厂都发起了自发性的斗争。《工人阶级》诞生了。成员包括阿尔科蒂、阿索·卢莎 (Asor Rosa)、塞尔焦·博洛尼亚、德·卡罗 (De Caro)、安东尼奥·奈格里和特龙蒂。这本杂志是帕多瓦、梅斯特、米兰、都灵、热那亚、罗马和佛罗伦萨的几个工厂活动团体的出版物。第一期出版于1964年1月，停刊于1967年3月。

1964年

10月9日，拉涅罗·潘齐耶里于都灵逝世。

1966 年

2 月 23 日，都灵有一万七千名菲亚特工人罢工。3 月 23 日，马格拉举行了总罢工与示威运动，参与者超过一万人。在都灵，也有一场阻止工厂遣散 Riv（生产汽车用滚珠轴承的）工厂的总罢工。随后，6 月，米兰也爆发了总罢工。

同年，在五金、化学、建筑、水泥以及食品产业中，公司与工人之间签订了集体合同。五金和化学业工人的罢工非常困难。米兰、罗马、那不勒斯、热那亚和的里雅斯特的工人和警察之间发生了冲突。野猫罢工在北方的许多场所爆发。

1967 年

马格拉港组建了“工人力量”团体，同名杂志开始以一定的频率面向工厂散发。

从 1967 年初到 1968 年的春天，学生斗争在大学中发展起来，数万名学生参与其中。学生大会（student assemblies）成为群众自决的政治场所，他们拒绝被委派成仅仅是参观者的角色。

学习小组和研讨班成为了集体分析和表达的机会。他

们产生了一系列的传单和其他文件，表达了运动的各种立场。不过，主要的力量是针对相关机构的斗争。意大利几乎所有的大学都被占领了。清校的警察与学生之间爆发了许多冲突。

12月，帕多瓦大学举办了关于“斗争和资本主义国家改革：从俄罗斯的十月革命到美国的新政”的研讨会。与会者包括美国奴隶制和劳工运动历史学家乔治·P·拉里克（George P. Rawick），女权主义者玛丽亚罗莎·达拉·科斯塔，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马里奥·特龙蒂。会议记录1972年由奈格里和博洛尼亚编辑收入《工人与国家》（Operai e stato）。

1968年

1月，学生被更大程度地动员起来，斗争变得普遍化。整个意大利的占领行动与警察对工人的驱逐在2月达到顶峰。3月1日，罗马的朱莉娅谷地爆发暴力冲突，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公共汽车与警用车辆被烧毁。一百五十名学生与多名警察受伤。2—3月，意大利主要城市（米兰、都灵、帕勒莫、博洛尼亚）的学生们发动了成百上千次的斗争。两千七百名学生被指控犯罪。始于反对学术威权主义的学生运动，很快发展为反对整个制度体系的运动，凸显

出了青年群体中的政治与社会的对立已经何等深刻地发生了改变，以及群众教育如何在质与量上转变为了知识生产力的培育。

4月6日，一群学生参加了菲亚特门前的纠察活动。90%的工人和许多雇员放弃工作，动员令要求工作时间减少到每周四十小时，降低频率，取消加班。各部门与各小组的停工持续了数天之久。

4月中旬，工人与学生联合反抗的第一段插曲，发生于位于瓦尔达尼奥的玛佐多公司（纺织企业）的一次长达十天的罢工中。期间，工人与警察之间爆发了剧烈的冲突，一些企业主的别墅被袭击并被纵火，汽车、宾馆、商店和创始人加埃塔诺·玛佐多的铜像被毁。一百零五名工人被拘留，四十七名被捕。

12月2日，阿沃拉（西西里），在一次农业工人总罢工中，警察在发生暴力冲突后射杀了两名工人，击伤十人。

1969年

4月9—10日，巴蒂帕利亚（萨勒诺），反对关闭当地唯一工业厂房的人群增加。大量警察介入。警员射杀了两名抗议者。次日，携带石头的武装人员袭击了警察营房，放火烧毁了大楼和许多警车。一天之内，在场的宪兵和警

察都被抓到然后解除了武装。

春天，工人的斗争蔓延到许多工作场所，涉及整个意大利的大、中、小型工厂。要求提高薪水和减少周期。这些主张构成了冲突的内在政治性。这种工人自治背后的驱动力是大型半自动化工厂（菲亚特、阿尔法·罗密欧、西门子、倍耐力、蒙特爱迪生石油化工等）中的冲突。

4月11日，工人们在菲亚特停止生产，并成群结队地走出工厂，走上因罢工而瘫痪的都灵街头去游行。5月11日，许多部门确定了几个小时的罢工，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不断发生。缺乏定期送料的装配线将无法再运转。野猫罢工变得普遍化。这种前所未有的斗争形式将能够使最富有斗争性的工人发现停止生产的可能性，可以通过关闭一个生产部门，停止一个车间乃至整个工厂的生产。斗争延伸到菲亚特的其他部门：里瓦尔塔工厂、林格托工厂、斯帕工厂、大型发动机厂、炼铁厂等。为扩大干预作用并传达米兰菲奥里工厂发生的事件的需要，周刊《阶级》（La Classe）诞生了，它初次出版于1969年5月1日，停刊于1969年8月。

6月，米兰菲奥里工厂停工了十五天。继而，罢工在所有其他公司普遍开展起来。菲亚特累计损失四万辆汽车的生产。

7月3日，工人宣布发动总罢工。下午两点，游行活动在从米拉菲奥里工厂开始前，警察就已经在图拉真大街口冲击了工人人群。一辆“Bisarca”（货运卡车）横置在图拉真大街上。战斗打响了，抗争延伸到整个城市南部，并波及到邻近的自治市尼凯利诺·蒙卡列里。在接下来的数天内，数万名工人被不断卷入冲突当中。

7月26—27日，全国工人委员会和先锋运动会议在都灵举行，各种政治路线在会上互相进行了参照对比。

8月28日，倍耐力工人占领行政中心并封锁了摩天大楼。30日，一系列的罢工与游行活动发生在米兰的倍耐力，佛罗伦萨、摩德纳和比萨的菲亚特，瓦尔达尼奥的玛佐多，维琴察的拉内罗西，帕尔马的萨拉米尼，巴尼奥利的意达尔西代，圣乔瓦尼镇的意萨，莱尼亚诺的祖凯利菲乔。倍耐力在9月2日仍被封锁。

9月，《工人力量》周刊开始出版。编委会成员有安东尼奥·奈格里、加伊罗·达吉尼（Gairo Daghini）、奥雷斯特·斯卡尔佐内（Oreste Scalzone）、马里奥·达尔马威瓦（Mario Dalmaviva）、塞尔吉奥·博洛尼亚、费鲁乔·甘比诺、艾米利奥·威施（Emilio Vesce）、圭多·比扬基尼（Guido Bianchini）。弗朗切斯科·托林（Francesco Tolin）担任主编。

还有一股对于技术人员的强大的动员，这些人员经常身处米兰许多工厂的一线，特别是西门子和倍耐力。其中斯那姆设计公司，国家核能委员会国家核物理研究所，伊斯普拉的国家科研委员会（CNR）和南部的意达尔西代，塔兰托的伊塔尔卡提埃里，巴尼奥利和斯塔比亚海堡的技术人员动员最为强力。

为了续签合同的罢工开始于 9 月。工人的强烈要求所有人工酬增长相同，并找到各种情况下互相发生冲突时的预备性方案。9 月 6 日，两百万名工人（金属工人、建筑工人、化学工人）在意大利各地罢工。百万金属工人停止罢工后，罢工在 9 月 11 日再度爆发，十万名金属工人封锁了菲亚特工厂；9 月 12 日，一百万名建筑业工人罢工。

米兰倍耐力的工人用一场令人记忆深刻的游行阻塞了所有交通。大众工人的斗争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渐趋增强且升级。这往往被称为“热秋”（Hot Autumn）时期的开始，尽管这一轮斗争周期却是之前就已经逐渐形成的。

在这里，我们仅记录如下：10 月 8 日，许多内部游行封锁了米拉菲奥里工厂；10 月 10 日，都灵被二十五万名金属工人所瘫痪。在菲亚特，内部游行驱使雇员们走出办公室，与此同时，警察们冲击着工厂外围。在倍耐力，警察冲破了木制围栏。14 日，在米兰，警察们凶悍地冲向仙比

奥内大道上的菲亚特工人们。在都灵，罢工和内部游行大行其道。在 10 月 29 日的米兰菲奥里工厂，斗争已经变得十分艰难。数以千计的工人们加入内部游行队伍，他们迫使工贼、雇员和经理们放弃工作。一百辆汽车与食堂被毁。菲亚特停职了七十名工人，并且检举了一百二十二名工人与工会成员。12 月 13 日，五万名工人占领了市中心，与警察发生激烈冲突。

11 月 1 日，周刊《不断斗争》(Lotta Continua) 出版，它停刊于 1972 年，同时同名日报开办。

11 月 19 日，工会在米兰指导了一次关于“为改革而斗争”主题的罢工，并在里瑞克剧院召集了一次集会。这一天里发生了很多示威活动和集会。游行结束后，当工人们离开时，警察正从剧院前面经过。一辆警车撞倒了两名工人。警察的侵害引发了直接冲突，爆发了激烈的斗争。在拉尔加大街，很多警车被阻拦并毁坏，在别处有更多冲突发生。一名因翻车去世的警察安东尼奥·安纳鲁马 (Antonio Annaruma) 被拉了出来。19 日的这场冲突里，五十名警察与宪兵受伤，受伤的工人和学生数量与此相同，其中十九人被捕。

从 11 月 28 日至 1969 年 12 月 19 日，工会在罗马组织全国示威活动；十万名工人参加，而 12 月初，都灵的菲亚

特再次发生两万名米拉菲奥里车身制造厂工人的自发罢工。12月4日，二十万名金属工人发起游行阻塞了米兰。12月7日，有关化学工人的合同签署，8日，关于公共部门中金属工人的合同签署。

12月12日，一颗炸弹在米兰农业银行爆炸，造成十七人死亡，八十八人受伤。一个反无产阶级法西斯团体宣称为此炸弹事件负责。

12月21日，非国有企业金属工人合同签署。

1970年

1—2月，重大的内部斗争继续在阿尔法·罗密欧、西门子公司石油化工、倍耐力、菲亚特里瓦尔塔等大型工厂开展，旨在改变工作类型，降低工作频率。

5—7月，重要的斗争发生于维内托大区的众多工厂中。在蒙特爱迪生，动员活动日益高涨，8月3日工人们为了停止生产活动，化工厂前被放置了路障；4日，所有区域的街区都陆续竖起路障，警察开始介入。警察用吉普车迂回前进。一些卡车遭到袭击起火。警察开枪并重伤两名工人，冲突与阻拦持续了一整个晚上。街区斗争在接下来的数天里继续发展，阻塞了梅斯特立交桥。火车线路中断，整个区域被隔绝了。

9—10月，在倍耐力的比科卡，在阿尔法·罗密欧的因诺琴蒂和奥托比安希，内部动员继续开展。在塔兰托，七百名炼钢厂工人罢工，与此同时，都灵理工大学的移民学生封锁了校园，反对缴纳学费。都灵的大学普遍被占领了。

12月12日，在米兰举行的1969年12月12日大屠杀周年纪念活动上，警察冲击了游行队伍。一名学生在齐眼高的位置遭到催泪瓦斯射击身亡。游行在数天之内爆发。他们感染了中学生，在几个主要城市制造了大量游行。1月8日，倍耐力的比科卡工厂被占领了一天，以回应管理层打算从工资单中拿走非工作时间的提成。

1971年

5月，占领房屋运动在罗马盛行。五百个家庭参与了该倡议。

在菲亚特，为削减工作时间的斗争爆发了。管理层解雇了五名工人，5月17日举行了一个车身制造厂的盛大集会。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新的罢工和游行离开了工厂并经过都灵。停工继续进行。5月23日，《不断斗争》和《工人力量》指导了一次旨在支持斗争的游行。在宫门市集，数千名工人和同志被警察攻击，随之而来的是一个硝烟弥漫的下午，数辆警车被烧毁。整整一天的时间里，五十四人

被逮捕，众多警察与宪兵受伤。

7月，在米兰房屋斗争期间，蒂巴尔迪街上成栋的建筑已经被占据了。在此之后，那里放置了大量的路障，人们与警察发生了多次恶战，持续数天之久。另有三万人的游行队伍穿过城市，反对驱逐的企图。即便在罗马，也有超过一百个家庭在首都的两个地区占据了公寓。

1972年

在米兰，在阿莱塞的阿尔法·罗密欧（与《无主报》一起），在西门子，在倍耐力关于斗争委员会的新方案中，在维内托关于马盖拉港的自动生产线的新方案（与《零工作报》一起）中，在罗马关于总医院和国家电力公司工人委员会的工人共同体的新方案中，大量工厂里成立了“自主工人大会”（autonomous factory assemblies）。

玛丽亚罗莎·达拉·科斯塔（帕多瓦）和塞尔玛·詹姆斯（伦敦）发表《妇女的力量与社会翻转》，从女性无偿家务的角度，对“工人主义”及更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女权主义批评。

12月3日，许多城市的自治工人团体之间召开会议。当年一月，在佛罗伦萨举行了与当前米兰、罗马、都灵、那不勒斯、佛罗伦萨和马格拉的进步人士的第二次会晤。

第二年 3 月，在博洛尼亚举行了一次有四千名进步人士参加的会议。

1973 年

2—3 月，都灵菲亚特进行了新一轮斗争。内部游行，破坏生产，攻击领导；3 月 29 日冲突达到高峰，在一万名工人的内部游行后，米拉菲奥里被占领了三天。工厂大门由停止生产的工人紧紧把守。

3 月，双周刊《红色》(Rosso) 第一期由“葛兰西小组”(Gruppo Gramsci) 出版。在当年 12 月，它担任了“运动内部报纸”的角色，成为“工人自主”(Autonomia Operaia) 运动的表达方式之一。

9 月，由塞尔吉奥·博洛尼亚主编的《五一》(Primo Maggio) 第一期出版。

1975 年

4 月 16 日，在米兰，一名学生克劳迪奥·瓦拉利 (Claudio Varalli) 被法西斯杀害。第二天，两万名青少年与警察和警察发生冲突。警方决定使用车辆冲击和驱散游行，车队中的一辆重型卡车撞倒了年轻的詹尼诺·吉贝奇 (Giannino Zibecchi)，致其死亡。在意大利的很多城

市，上万名群众走上街头，接二连三地冲击、袭击法西斯在各地的指挥部。鲁道夫·博什（Rodolfo Boschi）被佛罗伦萨的警察杀害。在都灵的米齐凯，《不断斗争》的进步人士仍活跃在一次关于住房权利的活动中。

12月，杂志《零工作》（Zerowork）第一期在纽约出版。

在理论层面的论争中，一种新的阶级构成（class composition）出现在“大众工人”（mass worker）到“社会工人”（socialized worker）的转型过渡，这是与社会工厂处于敌对关系的人群。这种假说的形成归功于奈格里的《无产者与国家》（1976）、《红色》杂志，以及分析第三产业化的阿尔科蒂的《大学与培育——活劳动中的社会知识的协作》（1976）与《中产阶级的大学》（1978）

1977年

2月，学生运动再度爆发。在博洛尼亚和罗马，成千上万的学生占据了大学，并与警方发生冲突。3月11日，博洛尼亚的一名学生被警方杀害，整个市中心都受到冲突和抢劫的干扰，警方出动装甲车介入；12日在博洛尼亚发生冲突；罗马，超过十万名年轻人的游行队伍在一天之内占领了市中心，随后与警察发生冲突；米兰和都灵也发生了

艰苦的巷战。在许多示威活动期间，双方都使用了枪支。

1978 年

3 月 16 日，“红色旅”（Brigate Rosse）绑架了意大利最大的党派天主教民主党主席奥尔多·莫罗，随后于 5 月 9 日将其杀害。

1979 年

帕多瓦检方逮捕了十九名帕多瓦、米兰、都灵与罗马的激进分子。其中包括奈格里、比扬基尼、斯卡尔佐内、达尔马威瓦。指控罪名是组织颠覆性的协会和武装团伙——“工人力量”“工人自主”和“红色旅”。诉讼程序在多年以后才得以进行，许多人被无罪释放。

6—7 月，随着金属工人合同的续签，工人斗争的新周期到来。在都灵，在菲亚特米拉菲奥里、里瓦尔塔、斯帕工厂、斯图拉·林格托工厂，斗争以内部游行、突然袭击、对老板和员工发动攻击的方式爆发。长达几个月的生产工作无法被厂房控制。在 7 月的最后一周，工人游行走出了工厂，封锁了城市，工厂入口和环形公路。

10 月 9 日，米拉菲奥里工厂、里瓦尔塔工厂和蓝旗亚基瓦索工厂开除了六十一名工人，其中大多数是自治委员

会的进步人士，该组织的内部网络促进了部门的斗争，同时站到了工会的对立面。这一举措是以打击恐怖主义的名义宣称的。在接下来的十二个月里，超过六千名被认定为缺席、缺勤、不合作和不服从老板的工人被分别解雇。菲亚特管理层打算改变权力关系，以实现汽车行业的高度组织化和技术重组。

1980年

9月10日，在罗马，菲亚特与金属工人联合会的谈判破裂，宣称将针对一万四千名雇员启动裁员程序。9月11日，第一轮米拉菲奥里的工人宣布结束罢工。经过三十五天的纠察和生产中断，工会与菲亚特在罗马签署协议；裁员被撤销，两万三千名工人的工资补偿基金（这是对离职工人一种暂时性补偿）得以实施。三个工会联合会的书记亲自参加集会，以便不惜一切代价完成合同签订；但绝大多数工人持反对意见。三名工会领导人拉马、本韦努托和卡尼蒂顶着愤怒工人的殴打被迫逃离，耻辱地寻求了警方的保护。两万三千名涉事工人中没有一个人再回到工厂。

在这些冲突的年份里，共计一千九百八十六名进步人士被捕，六千人受到调查，一千人受伤，三百七十人死亡。

根据 ISTAT 提供的数据，在 1969 年，七百五十万名工人参与冲突，导致三点零二亿工时损失；1979 年，损失为一点八五亿工时，一千五百万名工人参与，4 月 7 日之后的国家镇压致使数千人被捕，还有一部分人受到警察通缉被迫流亡国外。

机器的资本主义运用

拉涅罗·潘齐耶里

Sull'uso capitalistico delle macchine nel
neocapitalismo

Raniero Panzieri

发表于《红色手册》第一期，1961年。

众所周知，马克思认为，简单协作在历史上出现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进程的起始期。但这种协作的简单方式只是协作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基本形式的特殊形态。“资本主义的协作形式一开始就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资本的自由雇佣工人为前提。”^[1]但作为自身劳动力所有者和出卖者的工人，只能作为单个的人与资本发生关系。工人相互间的协作“是在劳动过程中才开始的，但是在劳动过程中他们已经不再属于自己了。他们一进入劳动过程，便并入资本。作为协作的人、作为工作有机体的肢体，他们本身只不过是资本的一种特殊存在方式。因此，工人作为社会工人所发挥的生产力，是资本的生产力。只要把工人置于一定的条件下，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就无须支付报酬而发挥出来，而资本正是把工人置于这样的条件之下的。因为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不费资本分文，另一方面，又因为工人在他的劳动本身属于资本以前不能发挥这种生产力，所以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好像是资本天然具有的生产力，是资本内

在的生产力。”^[2]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发展作为分工的发展过程，经历了许多历史阶段，而这一过程发生的基本场所是工厂：“工场手工业分工的一个产物，就是物质生产过程的智力作为他人的财产和统治工人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这个分离过程在简单协作中开始，在工场手工业中得到发展，在大工业中完成。在简单协作中，资本家在单个工人面前代表社会劳动体的统一和意志，工场手工业使工人畸形发展，变成局部工人，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并迫使科学为资本服务。”^[3]

技术的发展完全发生在这一资本主义的进程之中。尽管劳动已经分割，但工场手工业仍然以手工技能为基础，而“在工场手工业中执行职能的总机构没有任何不依赖工人本身的客观骨骼，所以资本不得不经常同工人的不服从行为作斗争”。^[4]因此工场手工业拥有的是“和它自身创造出来的生产需要发生矛盾”的狭隘的技术基础。

大规模引入机器标志着工场手工业向大工业的转变。这种转变意味着：“一方面，工人终生固定从事某种局部职能的技术基础被消除了。另一方面，这个原则加于资本统治身上的限制也消失了。”^[5]

被并入资本主义制度的技术立刻“摧毁了旧的分工制

度”，并“当作剥削劳动力的手段，在更令人厌恶的形式上得到了系统的”^[6]巩固。“过去是终身专门使用一种局部工具，现在是终身专门服侍一台局部机器……这样，不仅工人自身再生产所必需的费用大大减少，而且工人终于毫无办法，只有依赖整个工厂，从而依赖资本家。”^[7]

因此，技术进步本身似乎是资本的一种存在和发展方式。“甚至减轻劳动也成了折磨人的手段，因为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使工人的劳动毫无内容。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既然不仅是劳动过程，而且同时是资本的增殖过程，就有一个共同点，即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相反地，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不过这种颠倒只是随着机器的采用才取得了在技术上很明显的现实性。由于劳动资料转化为自动机器，它就在劳动过程本身中作为资本，作为支配和吮吸活劳动力的死劳动而同工人相对立。”^[8]

自动化的工厂在事实上（potenzialmente）建立起对关联着的生产者的支配。但在机器的资本主义运用中，在现代工厂里，“自动机本身是主体，而工人只是作为有意识的器官与自动机的无意识的器官并列，而且和后者一同从属于中心动力”。^[9]由此至少可以得出：1、机器的资本主义运用可以说并不是对某种就其自身而言理性的“客观”发展进程的扭曲或者偏离，正是资本决定了技术的发展进

程；2、“科学、巨大的自然力和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10]因此，对于“变得空虚了的”^[11]个体工人，技术的发展表现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资本，自动机在资本家身上获得了意识和意志。”^[12]在主人的头脑中，“机器和他对机器的垄断已经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13]。

工业化进程（随着它获得越来越多的先进技术进步）伴随着资本家权威的持续扩张。随着与工人相对立的生产资料在数量上的增长，对资本家来说实施绝对控制就日益必要了。资本家的计划是一种理想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他们的劳动的联系”——“在实践中作为资本家的权威和计划，作为他人意志”与雇佣工人相对立。因此，资本主义计划的发展与机器的资本主义运用的发展密切相关。协作和社会劳动过程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的引导下，等同于作为独裁的计划的发展。在工厂中，资本永远日益不断地如同“私人立法”一样维护其权力。它的独裁就是它的计划，一幅“对劳动过程实行社会调节……的资本主义讽刺画”^[14]。

资本主义的技术和组织转变， 及客观主义者的解释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式大工业体系的劳动分工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法论，来驳斥一再泛滥于（尤其是与自动化阶段相关的）技术进步领域的种种“客观主义”意识形态。技术的资本主义发展，通过合理化的各个阶段，导致了日益精密的统合方式，即资本主义控制的持续增强。这一进程的基本要素是不变资本相对可变资本的持续增长。众所周知，在当代资本主义之下，资本主义计划伴随着向垄断和寡头形式（它们使计划逐步从工厂扩大到市场和外部社会领域）的过渡而急剧扩张。

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技术发展和计划在其内在特征中并不包含可以确保现有关系“自动”转变或者“必然”被推翻的“客观的”、隐秘的因素。生产中逐步获得的新“技术基础”为资本主义提供了巩固其权力的新可能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于此同时，推翻这一制度的可能性没有得到增强。但伴随着这些可能性的是，面对资本主义机制的“客观骨骼”日益独立，工人阶级的“不服从行为”趋于具有完全的颠覆性。

因此很明显，“客观主义”“经济主义”意识形态最有

意思的方面与技术发展和工厂组织等问题相关。当然，我们在这里指的并不是新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是工人运动中表现出来的立场及其理论问题式。

与工会行动中的旧意识形态结晶相反，近年来阶级工会的复兴首先基于对当代资本主义“新现实”的承认。但一整套观点与研究正确地集中于与技术和经济当前阶段相伴随的变化之上的注意力，却被歪曲为“纯粹地”、理想化地表现这些变化，割裂了其与资本主义组织中总的决定性（即权力）要素之间存在的一切具体联系。^[15]伴随它对劳动的极端分割及对工人劳动的“分化”，合理化被看成是一个暂时的、必要的过渡阶段，通向“将被分割的劳动重新整合为一”的阶段。人们支支吾吾地承认，生产中活劳动的减少和不变资本的相应增加是在进行一个连续不断的循环运动，而“内外部之间互相依赖的纽带得到加强：如同在一个生产单位中，单个工作与单个工人只能被看成一个有机综合的整体的一部分；同样对于外部而言，每个生产单位及其行为都与整个经济秩序之间有着更强的相互依赖纽带”^[16]。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组织表现出的诸多新特征就被误认为客观“合理性”的各个发展阶段。于是例如，积极、“合理”地运用“方法时间衡量”法（MTM）得到了强调：“技术人员必须通过研究时间来研究作业方法！”^[17]

在“通过持续不断的流水作业来实现有计划生产的”现代大企业中，“工人或工人小组不适应企业生产计划的预期要求”^[18]所潜藏的巨大破坏性又为人所遗忘。人们念念不忘的反倒是“企业家与工人之间的所谓‘道德’关系”的必要性（即“合理性”）——“这种关系是所谓‘人的关系’（relazioni umane）的前提和目标，因为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建立起合作关系”。因此，“生产的统合必须配以企业内部工人的统合，并且这种统合必须是自愿的，因为任何约束或纪律都不会使人在自己的自由方面做出妥协，比如今天少干点，改天多干点”等等。^[19]于是，“这种（‘人的关系的’）运动日渐沉寂的原因在于，其理念的有效部分可以被‘消化’掉”，尽管工会理所当然地必须介入，“以摧毁这种密切关乎‘人的关系’的、有害的‘公司主义’（aziendalismo）形式”^[20]！这样便承认了统合过程的实在性：它们被认为具有一种内在的必要性，即其是“现代”生产特征不可避免的产物。人们只需记得，资本主义运用给这些进程造成的一定“歪曲”必须得到纠正。在这一框架中，甚至生产的“功能性”组织都仅仅被视为技术性的“升华”，是实际地超越此前机械化阶段等级化特征的跃进。甚至没有人去怀疑，向机械化水平更高的（和自动化的）阶段的发展进程所提供的新“技术基础”，或许

会被资本主义用来巩固和延续工厂组织的专制结构；实际上，整个工业化进程表现得受到使人摆脱“环境和肉体能力的限制”的“技术”宿命的支配。“行政合理化”和“外部组织”功能的极大增长，都被“技术地”或“纯粹地”看待。这些发展进程与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即其对日益复杂的、完成和执行其计划的资料的追求）之间，或者与工人阶级运动存在和斗争的具体历史现实（机械和组织的日常“资本主义运用”）之间的关系，都被田园诗般美好的技术图景忽略了。

对新技术—组织形式的“客观”看法极为严重地歪曲了现代工厂中雇佣关系的本质。有一种倾向认为，被分割的功能的消失，建立一元性的新任务，都涉及到责任、决策和技术工艺的多元性。^[21] 管理技术和功能的发展，被与其发生的具体社会环境（即资本主义权力的日益集中）割裂开来，并因此而被视为新层次工人（技术员、“生产性知识分子”）的基础。作为其新专业素质的直接反映，这些新层次工人将“自然地”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特征和需求之间的矛盾”。^[22]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在这里仿佛成了一种技术上的“不适应”：比如说，“在确定特定生产要素的最佳组合时（现在这一工作可以通过更客观有效的方法来完成）”，这些“新层次”工人经常“被迫放

弃客观上最有效的方案，以适应个人利益的局限”。^[23] 由此来看，“镰刀和锤子”无疑“只不过是当前人类劳动的理想性符号”！^[24] 所有这些，当然都直接影响着斗争的实际主人公如何看待工人阶级的斗争。当前斗争的现实表明，由大工厂当前组织造成的各种工人“层次”，往往殊途同归地要求自我管理。不言自明的是，这一过程发生在客观要素（表现为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不同“位置”、与生产和组织的各种关系等等）的基础上。但如果忽视或否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技术”要素和政治—组织（权力）要素之间的联系，那便无法把握“一元重构”过程的特殊要素了。阶级层次不是将自己表现为前进，而表现为是断裂；它不是现代生产过程内在的神秘合理性所进行的“启示”，而是建构与资本主义所实践的合理性相对立的全新合理性。当今大工厂工人借以获取阶级意识的进程（就像本期《红色手册》研究的那些一样）“不仅在于工作过程中扩张个性的初级要求，更是在于结构性地要求在企业内部并由此在社会中行使政治和经济权力”。^[25] 因此，前述“客观”地规定着生产过程中各种工人阶层的要素，确实对工人方面就生产要素的政治内涵形成“集体”意识有一定意义。但这些要素还与一种往往介入资本主义工厂当前技术—组织—所有权现实的方方面面的、一元的破坏性力量的形成有关。

制度的统合与平衡

显然，简单地认可合理化进程（即资本主义框架下生产技术演进的总体）意味着忘记了，正是资本主义的“独裁”在资本主义运用中取得了技术理性的形式。不仅机器，而且连“方法”、组织技术等等都被融入了资本，并作为资本与工人对立：一种外在的“合理性”。资本主义“计划”以对活劳动的计划为前提，而它越努力将自身表现为一种封闭的、完美的理性规则体系，它就越抽象和片面、越适于仅在等级式组织下被运用。能够确保与全球技术经济进程保持恰当关系的，不是“合理性”而是控制，不是技术程序设计而是为联合的生产者的权力所指定的计划。

实际上，在对当前资本主义企业的新问题和新矛盾进行的“技术性的”、伪科学的研究框架之下，是可能在不实质地触动异化的前提下，在确实保证制度的持续稳定的同时，找到对付新的不稳定性的更为“先进”的方法。实际上，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学和组织意识形态表现出的各个阶段——从泰勒主义到福特主义，最后到统合技术、人体

工程学、人际关系、交往规则等等的发展^[26]——都日益复杂精巧地，通过不变资本的持续增加和对生产计划的要求，使活劳动的计划适应发展而来的各个阶段。^[27]在这种情况下，旨在消灭从异化进程赋予大型理性化工厂的“总体”特征中迅速产生的工人阶级抗议的“信息技术”变得日益重要。自然，具体分析会发现自身面临天差地别的种种情况，并由此依赖于相当数量的特殊要素（技术发展的差异、资本主义管理的不同主观方法等等）。但我们这里想要强调的是，对于操纵工人阶级态度的信息技术的运用，资本主义有着相当巨大的“让步”（或者不如说是“稳定化”）空间。确定与整个生产过程相关的“信息”成为资本权力的稳定要素的界限是不可能的。可以明确的是，信息技术倾向于在当代资本主义公司更加复杂的情况下，恢复《共产党宣言》曾提及的劳动的“吸引力”^[28]（满足）。信息技术及其应用范围的扩张，与技术决策范围的扩张^[29]类似，都完美地契合生产的社会调节的资本主义“讽刺画”。所以有必要强调，“生产意识”并不导致推翻制度；工人参与资本主义的“合理性计划”，本身是一种处于资本主义制度极限处的统一异化要素。但是的确，只要工人阶级的行动被关注，新资本主义在“稳定要素”方面的上述发展就表明了推翻资本主义秩序的紧迫的必要性。工人阶级斗

争自身因而表现了对资本主义计划的全球性反抗的必要性，这种反抗最基本的要素就是意识到——我们可以称之为辩证意识——当前生产组织的“技术”与“专制”环节。革命行动要把握技术“合理性”，但其目的不是为了承认并赞扬后者，而是为了将其纳入新的运用：机器的社会性运用。^[30]

工资与政治奴役

伴随现代生产组织，工人阶级“在理论上”越来越可能控制并指导生产，但“实际上”，通过权力决策空前严密的集中，异化反而加深了。结果，一切工人阶级的斗争都倾向于与这一体系在政治上进行决裂。并且推动这一决裂的，并非新技术内含的“合理性”要求与它们的资本主义运用之间的冲突，而是工人阶级的集体反抗，要求生产过程服从社会权力。在革命性的飞跃中，一切技术—经济发展秩序的连续性都不会得到维护：工人阶级的行动质疑了制度在一切层面上的根基、影响和方面。

显然，技术进步深深根植于资本主义过程之中：恩格斯谈到过“日益加速相互排挤的发明和发现”和“以前所

未有的幅度日益提高的人类劳动的生产率”。^[31]但是在恩格斯从这一进程推论出“社会分裂为人数很少的过分富有的阶级和人数众多的无产的雇佣工人阶级”^[32]时，马克思却预见到了不仅名义工资而且实际工资的增长：“一方面工人的收入随着资本的迅速增加也有所增加，可是另一方面横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社会鸿沟也同时扩大，而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劳动对资本的依赖程度也随着增大。”^[33]因此，资本增长越迅速，工人阶级的物质条件越能得到改善。而工资与资本增长的联系越紧密，劳动力对资本的依赖就越直接。

在工资与资本的这种直接关系中，“生产资本的尽快增加是对雇佣劳动最有利的条件”：“工人阶级越迅速地扩大和增加与它敌对的权力，即越迅速地扩大和增加支配它的他人财富，它就被允许在越加有利的条件下重新为增加资产阶级财富、重新为增大资本的权力而工作，满足于为自己铸造金锁链，让资产阶级用来牵着它走。”^[34]

此外，恩格斯本在批判《爱尔福特纲领》时承认：“雇佣劳动制度是奴隶制度，而且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越发展，这种奴隶制度就越残酷，不管工人得到的报酬较好或是较坏。”^[35]（我们要强调的重点）列宁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方面：“马克思的理论也从古典学派那里接受了对积累的

这种看法，承认财富的增加愈迅速，劳动生产力和劳动社会化的发展就愈充分，工人的状况就愈好（就该社会经济体系所可能达到的程度而言）。”^[36] 马克思也表示，随着相对工资的降低，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社会鸿沟”会逐渐扩大。但很明显，这一说法包含着政治觉悟的因素，即清楚地意识到，物质条件的改善、名义与实际工资的增长所对应的是政治依赖性的加强。所谓向社会主义不可避免的过渡并不是建立在物质冲突的层面上的，而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它与社会裂痕的“不可忍受性”相关联，只能将自己表现为获得政治觉悟。但正因此，工人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是对资本主义发展得以实现的整套组织的否定（其中，技术由于关乎生产率而是首要否定的对象）。

因此，决裂（即取代工资—生产率机制）不可能表现为提高工资水平的“总”要求。显然，取代工资不平等的措施是取代那种关系的一个方面；它无论如何都不会保证与体系的决裂，而只不过是整个工人阶级套上“更闪亮的金锁链”。只是攻击异化过程的根基，并隔离对资本的日益增长的“政治依赖性”，是否可能塑造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阶级总行动？^[37] 换句话说，工人阶级的颠覆性力量、它的革命能力似乎（可能）正是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节点上才变

得最强，此时不变资本对于活劳动的压倒性优势，与前者体现的合理性一起，立刻使工人阶级面对自身政治奴役的问题。此外，整个“外部”社会进程对资本主义计划日益增长的依赖性（它起初只是企业水平），可以说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逻辑。众所周知，马克思不止一次地强调过资产阶级权力根基的这种持续扩展：最终，工厂分工变得与社会分工相一致——这当然不应该以粗陋的经济方式来看待。

消费与自由时间

“客观主义”接受企业水平的资本主义“合理性”，并贬低资本主义结构和发展节点内的斗争；但它倾向于强调工资与消费领域之外的行动的价值。这种做法的后果（伴随着对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资本与劳动之间更高层次的“辩证关系”的要求）是高估国家水平的行动、工会与政治运动之间差异—区别等等。因此，甚至在最为严肃和新近的讨论（在当今意大利，这些讨论主要发生在阶级工会的范围内）中，人们最终都会发现一种形式上更加批判和现代的、对工人阶级斗争旧有“民主”理念的单纯承认。

所有这些研究，所有让工会行动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相适应的行为，都有着变成一种仅仅是对内容上有所丰富、形式却更加神秘化的旧立场的认可的危险。由此，“广大群众的自治行动就只能受到老板决策的规定，再也不能走到他们的前面去了”。^[38] 随着资本主义积累内在进程在全球范围内都越发具备“内在”和“外在”的决定性地位（在公司水平上和在一一般的社会水平上），从凯恩斯主义的母体中涌现出来的（甚至是在工人阶级运动内部中的）种种立场体现了真正的意识形态，反映了晚期资本主义发展。马克思的警告仍然（事实上更加）有力地批判着这些意识形态：“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39] 工人阶级应当提出与资本主义所“强加”的消费相对立的“健康”消费，这并非事出无因；同样并非事出无因的还有，工人作为“人类”一员所提出的全面提高工资（即认可资本主义奴隶制）的“诉求”，（在资本主义制度内！）要求承认和维护他的“尊严”。^[40] 正如斯佩索（Spesso）已经正确指出的那样，如果不拒斥资本主义合理化，如果工人阶级不对生产领域提出控制和自我管理的要求，那么即使把“基本需求”（文化、卫生）拿来与资本主义（或者说新资本主义）所强加于工人阶级之上的消费进行对抗，也是

徒劳无功的。^[41]值得注意的是，“修正主义”立场会提及并歪曲马克思关于自由时间、其与工作日的关系以及其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地位的看法。换言之，在“经济主义”解读的基础上，有一种将自由时间的增加等同于马克思思想中共产主义自由的倾向。而这种增加的基础是对生产过程日益“客观”、合理的计划。^[42]实际上，对于马克思来说，个体能够自由地进行精神和社会活动的自由时间决不能简单地与“工作日”的缩短对应起来。它的前提是人类劳动条件的剧烈变革、雇佣劳动的废除和“对劳动过程实行社会调节”^[43]。换言之，其前提条件是彻底推翻专制与合理化之间的资本主义关系，以建立由自由生产者管理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为生产而进行的生产被废除，有计划的生产、计划本身、合理性和技术永久地服从社会力量的控制，因此（且仅因此）劳动能够成为人的“第一需要”。作为社会进程和阶级斗争的目标之一，克服分工并不意味着向“自由时间王国”的飞跃，而是意味着实现了社会力量对生产领域的支配。

如果被表现为一种与人和生产过程的关系无关的、与工人在自由联合生产者社会中重新占有劳动产品和工作内容无关的“对自由时间的享受”或者抽象的“全面性”等等，那么人以及其体力和脑力能力的“全面发展”（许多对

“工业社会”的“人道主义”批判喜欢这么说）就会成为一种神秘化。^[44]

革命视角下的工人监督

规定着工会斗争的工人阶级“新”要求（本期《红色手册》中有研究）不会直接提供革命性的政治内容，它们也并不意味着会自动地朝向那一方面发展。不过，也不能因此就将其意义和价值仅在于适应了现代工厂中现代技术和组织进程——在更高水平上实现总的工作关系“系统化”的前提条件。它们包含了与工人阶级整体及其政治价值相关的发展指标。然而这些指标并非简单地从无到有，或者把那些与传统目标相比貌似不同和更为“进步”的要求整合在一起。节制工作速度和节奏、劳动力和工资与生产率关系等等的合同，显而易见地倾向于在积累机制内、在其“稳定要素”的范围内反对资本。这种合同和工人阶级核心斗争在最强大、最发达企业内以同样速度扩大的事实，证明了它们的先锋队、颠覆本质。对于在仅关乎工资的一般斗争中利用这些合同的尝试来说，想要达成阶级行动的新的、更广泛的团结只不过是一种幻想。在这条道路

上，实际上能够得到的恰恰是其目标宣称要避免的东西，即倒退回封闭于企业的状况，这是忽视政治斗争潜在因素的必然结果。可以被客观地认定为一种可行的假说—指导的倾向性路线在于加强和扩大自我管理的要求。由于自我管理的要求并不是单纯地要求“认知性”参与，而是要影响具体关系的合理化—等级制度—权力，因此它们并不会被封闭于企业范围之内。恰恰相反，它们所导向的正是反对资本在各层次对社会整体策划和实行的“专制”，而且它们被表现为，要求通过上述工人阶级的全球觉悟和全面斗争来彻底推翻这一制度。

我们实际并且迫切地认为，这条路线可以被表述为工人监督的要求。然而，这里必须做一些澄清。工人监督的口号如今可能被认为，对于削弱斗争中的革命要求、或者按照传统路线调和它们的“中派”道路，是模糊的、类似的。的确存在如此利用这一口号的可能。比如说，在提及工人监督时，指的是继续或复兴管理委员会（Consigli di Gestione）^[45]的理论与实践，这便是唯意志论和模糊不清的。在管理委员会运动中，对工人监督的真正要求——从属于湮灭节点——从属于与全国重建意识形态紧密相连的“合作主义”因素，从属于一条将以制度—选举计划为目的的实际运动工具化的方法。当工人监督的路线被作为一

种“可接受的”替代方案、当成一种对工人彻底自我管理的“极端主义”的“修正”而提出时，就可以辨别出同样的模糊不清。现在显而易见的是，工人监督的非神秘化构想只有以革命决裂的目标，并且处于社会主义自我管理视角下，才是有意义的。在这一框架下，工人监督就表现了弥合当下甚至是工会层面最先进的工人阶级要求与策略视角之间鸿沟的需要。因此它就以一种非神秘化的方式代表了（或者说可以代表）这样一条政治路线：它能够直接代替那些现在正由工人阶级政党推进的路线。

很明显，在这里是把工人监督的路线，当成一种能够加速整个阶级斗争的因素、一种可以“缩短”革命决裂的时间尺度的政治手段。工人监督还远远不可能成为夺取政治权力的“替代品”，所以它应当包含一个（作为对这一制度的根基的明确威胁）对资本主义权力施以最大压力的阶段。由此，工人监督就必须被看成与全面夺取政权相关的“双重政权”的预备。

坚持认为此时此刻将工人监督作为政治总要求而加以推动就毫无意义了。真正重要的是，反对口号的辩论不应当充当逃避由工人斗争所引起的政治总问题的托辞；而且人们应当切实地以这些斗争为基础，努力重建一种足以防止工人阶级活动的“工联主义”退步及其重新融入资本主

义发展的新政治视角。

Karl Yanx 译

朱 剑 校

[注释]

[1] 《资本论》第一卷，第 388 页，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2] 同上，第 386—387 页。

[3] 同上，第 418 页。

[4] 同上，第 425 页。

[5] 同上，第 426 页。

[6] 同上，第 485 页。

[7] 同上，第 486 页。

[8] 同上，第 487 页。

[9] 同上，第 483 页。

[10] 同上，第 487 页。

[11] 同上，第 487 页。

[12] 同上，第 464 页。

[13] 同上，第 487 页。

[14] 同上，第 488 页。

[15] 在我们看来，有必要引用工会“转向”的原始文献，因为这是继续辩论的基础：“工人与技术进步”，载《关于意大利工厂工作关系中技术、组织的变化的会议记录》，该会议于 1956 年 6—7 月在罗马的葛兰西研究所举行；西尔维奥·莱奥纳尔迪所著《技术进步与劳动关系》，该著作是对他在葛兰西研究所会议上所提交论文的详述和发展，我们用作基本参考文献。关于这一讨论更晚近的发展，可以参见下面引述的“技术进步与意大利社会”大会（1960 年 6 月召开于米兰）的论文和稿件，还可参见本期《红色手册》所载迪诺·德帕尔马（Dino De Palma）的调查。注释中我们省略了讨论中的大量文献（无论是关于晚期资本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对工会运动进展的辩论也只是一笔带过。

——原注

[16] 《技术进步与劳动关系》，第 93 页；另见第 35、46、55 页及其后。——原注

[17] 同上，第 48 页。——原注

[18] 同上，第 50 页及其后。“仅仅单个工人的迟到或旷工，或者甚至只是其产量的降低，都会在整条生产线上反映出来”，等等。——原注

[19] 同上，第 50 页及次页。——原注

[20] 同上，第 52 页。——原注

[21] 同上，第 55 页及次页。——原注

[22] 同上，第 82 页及次页。关于“生产性知识分子”的“彻底异化”，可参见皮诺·塔利亚祖基（Pino Tagliacucchi）在《现代辛加迪》1967 年 2—3 月号第 58 页及以后刊载的《现在工厂的白领状况》一文中富有洞察力且切中要点的观察。——原注

[23] 《技术进步与劳动关系》，第 81 页及次页。——原注

[24] 同上，第 67 页。——原注

[25] 阿尔科蒂《关于菲亚特的斗争文件》，载《红色手册》第一期。
——原注

[26] 诺拉·米特拉尼《技治主义的野心》，载《国际社会学手册》第三十期，第 111 页。——原注

[27] 弗朗哥·莫米利亚诺（Franco Momigliano）已经正确地指出：“现代工厂不仅使工人越来越无法有意识地参与制定合理生产计划的实际过程和全球生产过程中；它还要求从属于新的合理性的工人同时体现出‘反合理性的’环节，这与‘胡乱应付’的旧经验主义哲学是一致的。这样看来，自相矛盾的工人阶级的反抗本身是否就被合理地利用了？”（《现代工厂的工会》，载《过去与现在》第十五期，第 20 页及次页。——原注

[28] “由于推广机器和分工，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而对工人也失去了任何吸引力。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8 页，中央编译局

译)——原注

[29] 关于需要工人“民主”参与的更合理的资本主义的管理方式，参见西摩·梅尔曼 (Seymour Melman) 的重要著作《决策与生产率》。

——原注

[30] 苏联经济和科技研究的最新发展表现出模糊性：对研究中自主权的呼吁毫无疑问代表着与计划中粗暴的斯大林主义唯意志论做出决裂，然而脱离社会对生产的控制的合理化过程的发展看上去倒是（现在已经到了何种程度，未来又可能到什么程度？）变成了原有官僚化过程的新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基础。但重要的是，不要忽视苏联的计划与资本主义计划的差异性——资本主义关系内所产生的指令式的、专制的生产组织要素在官僚形式的计划经济中保存了下来。考虑到与工人阶级的关系，官僚不能单纯诉诸客观合理性；他们必须诉诸工人阶级自身。可以说，基本要素（即所有权要素）的让渡使得官僚组织失去了自身的基础。因此，在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中，矛盾的表现方式是不同的，而独裁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不确定而非有机的特征。当然，这不意味着，它不会表现得像资本主义社会的独裁那样粗暴；参见鲁道夫·莫兰迪 (Rodolfo Morandi) 的几篇观察报告：《管制经济的分析》(1942)、《集体经济的组织标准》(1944)，1958年由“人民斗争”在都灵再版。如大家所知，对所有权因素的排除与对专制—官僚因素或技术异化（或两者皆有）的简单研究，是如今浩如烟海的新资本主义和新改良主义意识形态文献的中心；本期《红色手册》将

对这些意识形态进行分析。——原注

[31] 恩格斯《〈雇佣劳动与资本〉1891年单行本导言》，收于《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第709页，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32] 同上。

[33]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收于《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第734页，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34] 同上，第735页。

[35]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收于《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第441页，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36] 《评经济浪漫主义》，收于《列宁全集》第二卷，第118页，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7] 参见《政治与经济》近期的讨论，主要是加拉维尼（Garavini）、塔托（Tato）、纳波莱奥尼（Napoleoni）等人的文章。——原注

[38] 鲁杰罗·斯佩索（Ruggero Spesso）《工人的交易能力与垄断的“合理化”》，载《政治与经济》1960年11月号，第10页。莫米利亚诺的观点应当特别地加以研究；他正确地重新提出，就工会而言，对“现代世界的组织与合理化机构”的考量必须以“探索工人阶级进行有效竞争、取得霸权地位的条件”（《现代工厂的工会》，第20页及以后）。在许多场合，他都坚称，工人阶级需要通过这种方式，在与资本面对面对抗时重新赢得真正和完全的自治。但很难理解他如何将这些

论点和要求与他对工会的“特殊机构领域”的认可调和起来，后者使他拒绝承认工会行动本身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来说有着越来越具有破坏性的矛盾。参见莫米利亚诺《辛加迪的报酬与运作结构》，载《社会主义问题》1961年6月号，第633页；《现代工会主题》，载《过去与现在》第十三期，以及他在“技术进步与意大利社会”大会上所做的“工人和工会与意大利工业生产过程转型面对面”发言。——原注

[39]《资本论》第一卷，第204页，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40] 参见安东尼奥·塔托（Antonio Tato）《基于工会逻辑和目的的报酬结构秩序》，载《政治与经济》1960年2—3月号，第11页及其后。生产领域日益扩大的直接社会影响领域，当然在一切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都得以强调。与其他作者类似，保罗·斯威奇用许多现在仍然有用的方式对此进行了阐释，参见他的《资本主义发展论》纽约1968年重印版，尤其是第239页及其后、第270页及其后。斯威奇重申了（第249页）罗莎·卢森堡在《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的话：“社会监督……不是对资本主义所有权进行限制，相反倒是对它实行保护。或者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它们不是对资本主义剥削的干涉，而是对这种剥削的一种调节、安排。”对于英国限制工时的法律，参见《资本论》第一卷，第八章“工作日”的第六节“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对劳动时间的强制的法律限制。1833—1864年英国的工厂立法”。（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0页及其后，中央编译局译）——原注

[41] 参见《工人的交易能力与垄断的“合理化”》，第9页及次页：“如果有人认为他不可能将自己的文化消费用于本人的创造活动——换句话说就是劳动过程中最卓越的那一部分，那么盼望……提高文化消费就毫无意义……个人的消费本身完全受制于其在生产活动中的位置……在获得对工作的意义和作用的工人阶级意识的过程中对‘工作规则’的拒绝，使他的‘本质需求’（文化、健康）得到提升、规定和确认。”将新资本主义的异化解读为消费者的异化是当下意识形态中最荒谬和流毒最广的一种。——原注

[42] 参见保罗·卡尔丹（科尔内利奥斯·卡斯托里阿迪斯 [Cornelius Castoriadis] 的化名）《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载《无产阶级团结手册》第三期。需要澄清的是，卡尔丹提及这一解读，是为了展示一种针锋相对地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点。——原注

[43] 《资本论》第一卷，第488页，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44] 苏联意识形态普遍将共产主义社会解释为产品（甚至不单指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和“自由时间”的社会，这显然是对劳动进程的一切有效社会调节的否定的结果。今天，“技术的”幻想已经开始被用于维持这种意识形态。例如斯坦尼斯拉夫·斯特鲁米林在《通向共产主义之路》中认为，“在生产过程中指导功能”就是“技术”控制，就是“神奇的自动机制和可以‘思考’的电子机器等技术的发展”造成的工作中“更多的脑力内容”。所以，自动化将使建立由拥有“自由时

间”的消费者所组成的真正的“丰裕”社会成为可能。乔治·弗里德曼（G. Friedmann）的《工业社会》是在这一方面扭曲马克思原意的典型范例，书中将工人重新占有产品和工作内容本身等同于“对工作的心理-生理上的控制”！——原注

[45] 在二战最后几个月里，为了维持工厂的运作而建立了许多管理委员会，当时抵抗力量主要分布于意大利北部。在1945年4月25日法令中被所有反法西斯政党承认的管理委员会，显然大半是阶级合作机构，主流工人阶级政党也是这么看待它们的。这一运动在1947年11月召开全国大会时达到了顶峰，并随着转向共产党而短暂地左倾。此后，这一运动就急剧地衰落下去了。——英译者注

菲亚特铸造厂的野猫斗争

罗马诺·阿尔科蒂

Lotta alla FIAT. Un aspetto recente: il 'gatto selvaggio' negli scioperi delle fonderie e dell'Aeritalia

Romano Alquati

发表于《工人阶级》第一期，1964年。

本文简要地分析了菲亚特（汽车公司铸造厂）工人近期采取的所谓“野猫”（a gatto selvaggio）^[1]斗争模式的一些内容；本文并不认为这是“唯一”可行的模式。本文是一篇“具体的”分析，但并不是由于文中所描述的事件是一种例外或是专属于菲亚特工人的“核心大众”（nucleo di massa），而是因为本文并不直接分析使这次运动成为“政治”（运动）的一般性，而是将这种一般性作为决定性的前提。（你在本文论述中所见的关于政治工人崛起的其他决定性组成部分，将在下一篇关于阿尔法·罗密欧〔汽车制造厂〕的文章中作进一步探讨；由于下篇文章涉及工人斗争进程的一般性，因此讨论可以更进一步。）

1963年10月15日至16日，菲亚特的工人发动了自1962年6、7月间以来最重要的一场罢工。六千二百名铸造厂工人“自发地”离开了……工人斗争第二天“自发地”扩大成了一场野猫罢工；10月15日周二，第4车间的早

班工人毫无征兆地停止了工作，这标志着“正常”轮班发生了没有经过事先计划的停工，随后下午的轮班也停工了。

这场罢工的标志是其“模糊性”，而工人斗争在这种“模糊性”中利用了资本主义合作的生产联系！

铸造厂的第4车间是装配和维护车间，跟其他地方相比这里的“专业主义”遗产保存得（相对）更为完好，但是工人们发起的罢工却是反合作和反公司的。事实上，铸造厂坐落于米拉费欧丽巨大建筑群的中央，还是不同关键生产流程（汽车、牵引车、卡车）的节点，所有生产过程均直接采用“世界性的”劳动分工进行联系，菲亚特（此时作为世界社会资本）通过将其统一起来而对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的工人阶级进行剥削！以下是罢工的基本和直接素材：菲亚特的工人斗争应该被视为工人对老板在国际维度上的回应，而不能直接被看成是“个人”或“单个”资本家与十三万直接受剥削者之间的对抗，因为受剥削者在斗争中总是将自己视为一个总的运动的先锋。

野猫罢工并非一种由无法通过有组织方式进行集体斗争的工人所展开的无政府式的抗议形式。相反地，野猫罢工需要很高水平的组织力和凝聚力，因为野猫罢工是典型的“一般”斗争形式，所以就因为菲亚特是“全球性的”

就把野猫罢工看成是局限于一家公司的内部部门和车间的斗争的有形联合，是非常荒谬的！野猫罢工于 15 日所取得的首场胜利，这场胜利在都灵之外对现代历史（正因为十分重要，所以这件事才鲜为人知）进行了阐释、去魅和传播，这段历史见证了一个工人组织在菲亚特不断发展壮大，直到能够赢得这种罢工：它完全不属于历史上已有的组织和官方组织。

菲亚特的野猫罢工推翻了一种老的观点，那就是工人斗争在这种水平上必须由特定的内部“核心”（nucleus）进行组织，这种观点在工人的反抗意识中形成了垄断。10 月 15 日至 16 日的罢工直接由全体相互之间有着紧密联系的“社会大众”直接进行组织，这些人来自于参与生产的各部分工人：但是在此我们仅就近期斗争的一个特点进行阐明，这一特点并不仅限于菲亚特——1962 年 6 月以后老政党中的少数“激进成员”在此处落在了斗争的后面。

自 1953 年和 1954 年国际斗争发生第一次剧变后，作为群众组织的意大利劳工总联盟（CGIL）就从菲亚特消失了。如今我们看到，一方面官方工人运动对意大利工人阶级开始“失去控制”，另一方面向自动过程发展的机械化进程是如何坚定地使工作朝着社会化的方向大步飞跃。

1956年在铁幕两侧发生的国际斗争的第二次浪潮加快了意大利斗争的高涨和转变：所以一场由工人直接管理的“地下”斗争在菲亚特重新展开。1960年后国际罢工的第三次大浪潮使得运动变得更激进，并在世界水平上进行大规模地联合，菲亚特工人公开地回到了斗争和经验的政治宣传中心，正是这种政治宣传让工人阶级“为了自己”统一、重构和整合了起来；作为一个社会阶级的工人们重新为自己确定了斗争的方法和目标，进一步减少了“工会”的影响。从一场斗争到另一场斗争，从一种组织形式到另一种组织形式，方法和内容的同质化得到了增强：因为工人的主动权掌握在“紧密联系的社会大众”的手中，甚至是老板现在也必须仅以工人的“社会阶级”为基础制定提高产量的一般策略了。

在寻求进一步实现社会化的“流畅”路径的探索过程中，斗争进一步推动着资本。今天，老板的任务是推翻社会紧张局势内部进行“结构性改革”的政治障碍：即作为先决条件，实现对工人阶级彻底地政治控制以及获得工人阶级的合作，斗争对老板来说意味着更高的“生产力”并更强的“政治专制”。

合作和政治控制

意大利共产党保证斗争将“以要求为基础”，意大利冶金联合会（FIOM）保证他们将以更巧妙的政治方式对所有的斗争进行限制。

如果我们再后退一步将会明白，国际斗争已经如此迅速地侵蚀了“菲亚特体系”的边界（既包括“内部边界”也包括“外部边界”），以至于在老板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它们不惜面对失去对工人的政治控制的危险。

在中左翼的框架中，“现代合约”的平台再一次展示了老板快速夺取彻底政治控制的能力；这一平台需要工人通过工作的进一步社会化，与大规模的、合理化的生产力增长进行“合作”：“自动化”“多元化设计”“国家改革”；工人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大脑的角色已经被重构掉了，它们被囿于一种死劳动之中，囿于机器之中，尽管这种死劳动的水平更高了；资本主义生产以更高的合理性来对工人阶级进行管理，但是也令自身与工人对立了起来，并通过资本的政治支配对工人进行镇压（以固定资本的形式）。

如果工人为这份只写满了老板的需求的合同而奋斗，

那么这场斗争就必定将变成（老板计划的）实施了。

但是本应居间促成这一规划的工会不再具有影响力。阶级的重构已经远远超出了拉·玛尔法和布鲁诺·特伦廷的估计。^[2] 所以工人阶级成功地把上述的整个规划打了个措手不及：事实上通过出其不意地让十万名菲亚特金属工人加入合同金属工人的罢工，将所有的斗争统一起来之后，工人们在工厂的大门前，在纠察队中，在所有工厂、部门和区域发生的反对罢工由工会领导的广场斗争中，以及在罢工的民主计划中都展现出了团结性。在工人的这种团结性面前，老板的软弱一览无遗。通过统一斗争进行政治上的“自我暗示”^[3]，工人阶级成功地在资本的飞跃中实现了自己的飞跃。工人实现了战略胜利后，视角发生了变化：现在“流畅路径”实际上变成了“突飞猛进”，变成了工人阶级在老板的政治控制之外进行政治组织和重新进行联合的时机。

因此：从正确的视角来看，老板的现代化和合理化规划将不得不对主动进行重构的这个工人阶级施加“合作”和政治“控制”。

工人阶级必须“长期”对抗老板“工业民主”的规划：工人阶级的“战略目标”是在国际水平上、在资本主义生产之外，组织真正的“政治的”自我管理以对抗资本的“一

般政治权力”。

为了实现斗争正在推进的这一近期“战术目标”，就要继续在老板的“政治控制”之外进行斗争，这种斗争再一次被限制在生产和资本积累之内，只不过是社会水平上或在广场中。

工人阶级通过“突然的”飞跃利用了老板所赋予的这一角色，来确定资本“委员会式”^[4]规划的形式，以将工人阶级的潜在政治霸权提高到资本主义社会化的更高水平上去。“非合作”的“战术运用”迫使（Costringere）^[5]老板越来越多地去尝试更先进的规划，对在工厂内部形成的工人紧张局势进行“改良式的恢复”，这些规划随后遭到反击并被粉碎了，进而牵制了老板的“战略”计划。

工人的“非合作”破坏了资本主义生产内部的这些计划，因为只有工人阶级团结一心，像毛细血管一样在生产过程中联合起来，（非合作）就能发挥作用……今天，（资本主义）发展规划和政治基础之间的关系如此紧密，以至于大规模政治事件要么被神秘化成了“技术”上的变迁，要么被神秘化成了直接的“反抗性”。

工人阶级以它所拥有的武器进行反抗：“自发者”（accusation）就算任用那些不成一事的人，也不应该任用那些责备工人阶级一事无成的人。正如在都灵法律广场（暴

动)中发生的那样,没有一位工人误以为这是摧毁资本主义体系所必须的暴力行动,所以也没有一位工人误以为这种“非合作”的使用本身就是一场革命性的政治斗争。在1962年7月发生的瓦莱塔停工中就已有工人认识到将“鼯鼠挖洞”(mole's work)变为最新占领区的急迫重要性了,这样就可以利用长期组织方法加强自身,对抗老板的有机反击了。

在菲亚特协议被推广至新合同后,菲亚特面临的一般斗争循环运动将选出并重新开展相关组织形式和目标,这些组织形式和目标只会更好地对老板政治计划的更高层面进行反击。

“非合作”的第一次临时行动轻易地取得了胜利,因为老板采用的战术只能是向团结一致的工人再次提出此前已经被拒绝了“厂内工会”的最新形式:在1962年至1963年的冬季,这些形式确实失败了,开始是在菲亚特和阿尔法·罗密欧失利,然后是在所有的地方都一败涂地。

非合作不是一种在劳动过程中制造混乱的手段,野猫斗争不是一种阻碍劳动过程的方法:但是不出意外的是,老板的报纸和新闻通讯却达成一致,它们将工人斗争的实际政治意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给政治上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所带来的巨大政治可能性都隐藏在了在“破坏行为”

这种古老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形式的背后。

在“合理化改革”后的公司中所出现的更加典型的长期斗争，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显而易见的。这种现象的基础是，只有集体化的工人才知道劳动的对象已经通过模具和“标准”的工作指南而发生了“改变”。资本的职员（工会会员或个体资本家）不会因集体工人被迫经常“违反”相关规定的这一事实而感到惊诧，工人的目的是为了在其自身的理性范围内平衡以阶级剥削为基础的这一体系的根本非理性，正是在持续不断的创新中才能实现对资本的控制和生产力的提升。^[6]

然而真正令他们惊诧的是，集体工人将在政治重构中摧毁生产的“合作”，其中“机器操作员”（addetto macchina）沦为“质量控制人员”，或者“技术人员”“专家”甚至是“工程师”的“管理”职责不断下降，以至于他们最终将自己视为“工人阶级”，然后所有人联合起来形成“工人阶级”，他们利用对（把他们囚禁起来的）现实劳动过程所进行管理，来对老板再次对他们进行政治控制的规划展开反击。

朝着“野猫”罢工的方向

工人通过“非合作”所建立起的认识和组织水平所使用的一系列具体形式，面对在全球资本主义前沿上达成了政治组织并联合起来的老板，而变得越发决绝……然而到了1963年，工人迫使老板绕过工会，而自行采取措施以试图控制工人：（老板）要求工人们将资本主义生产内部的“自主”组织进行具体化，并以有助于发展合理化功能的方式提出有益的要求，而失败的“工厂工会”无法提供这种合理化功能。1963年7月，工会（对外扮演的角色是资本“民主”进程中的宣传者）采取了另外一个有趣的步骤，工会向工人提出建议，工人可以“自主地”进行组织，但是工会必须扮演调解角色，这便是“工人控制”（Controllo Operaio）计划。但是工人已经控制了生产，由于老板通过对合作的收益进行监管来控制着工人，并将工人“联系”到以“到场”为基础的总产出上，所以工人拒绝踏入这一陷阱，一切将永远处于谈判中，从现在起事情又回到了原点。

资本的“委员会主义”^[7]就此产生，它认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控制就是对斗争的控制，这种控制的形式应当是工人的“自我控制”：即工人赋予自己权力，自主地在老板的

长期计划内开展斗争，在更加一般化的水平上对工人的自我管理进行制度化。这一替代方案介于两种延续性之间，其一是通过对整个斗争进行民主控制的方式以实现资本的延续性，另一种是斗争日益无法控制的“延续性”。^[8]

1963年，只有在第17车间才发生了（其中的三场）显然属于老板的“委员会式”计划的罢工：罢工以地方性的借口自发性地展开，虽然工会不顾后果地大造声势，要求工人们将这种形式推广到所有的部门，因为“这样做很好”，但罢工一事无成。尽管在所有的部门中，工人们完全意识到了拒绝按照工会所要求的联合形式组织斗争的政治意义，但是他们还是拒绝扩大斗争范围，因为上述方式是一种在资本内部对“工人异见”进行民主制度化的形式。1963年，工会的处境不佳，但是工人斗争通过“非合作”的形式不断扩大并统一起来，并受到了持续不断的政治讨论的激励，工人的“隐形组织”通过讨论变得更加明确并得到了加强。工人在生产节点不断举行政治会议，这一举动随后发生在“工人城市”更广阔的社会构成之中：年轻人是这些人的先锋。菲亚特的工人有意地去收集、批判和筛选国际工人斗争的经验，以找出看起来最适于对老板正在筹备的规模越来越大的总攻进行反击的形式；特别是在巴黎“地铁”工人罢工后，他们特别赞赏在合同式罢工没

落后已经开始在意大利萌芽的野猫罢工。

工人们最喜欢野猫罢工的地方正是它的不可预见性：不可预见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又会进行罢工。这种工人斗争形式的政治影响范围体现在：1) 工人斗争需要“隐形组织”，一种未进行制度化的组织，一种未成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内部自主组织的组织；2) 通过持续不断、出其不意地轮流使用各种罢工战术、方法、时机和地点实施斗争；3) 它没有要求。

因此明确的是，工人并未将其视为斗争的唯一形式，但是工人们确实将其视为最先进的“非合作”形式。

野猫罢工并非摒弃大规模罢工或广场斗争；这些形式可以交替进行，反复开展，相互支持；但是野猫罢工的维度有所不同。一个政治组织的任务不是以预先确定的方式计划野猫罢工，因为这样可能带来由于罢工可以预测而让老板能够控制罢工的风险；与其相对，组织必须协助促进罢工，而且为了组织罢工并将其扩大，只要存在工人的“隐形组织”以使野猫罢工成为长期事实而存在就足够了。

因此野猫罢工不是革命性政治斗争的一种模型：今天野猫罢工依旧在拒绝（联合斗争），工人们也意识到了这点。

铸造厂继续罢工

但是（为了证明“隐形组织”确实意味着拒绝进行组织的对立面），工人经过讨论后转而开始以“可见”的方式展开罢工。8月1日（就在《野猫》报纸的发行被都灵所有知道并讨论此事的工厂热烈欢迎并广为传播之后），工人们差一点就在全菲亚特的关键车间——第7车间展开野猫罢工。但是罢工最终没能在第7车间展开，反而于10月15日在铸造厂组织进行。现在我们能够准确地认识到罢工工人拒绝诉诸新的内部委员会（CI）的重要性了，尽管工人们五天前才刚刚把他们选出来！即使工会通过小册子向工人们提出恳求，工人们还是停止了斗争。

“替代方案”无法在工厂里找到替代方案。根据国际资本的意大利分部、神秘的维托里奥·瓦莱塔^[9]的记录，工人们已经在金属制造工人工会（FIOM）进行了投票，提议扔掉“官僚”的每个“借口”，并再次绕过工会，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工人回应的巨大重要性，清楚工人的回应成功地摧毁了另一个规划：工人们想要的不是像CI一样的老式“垃圾贩子”。因此瓦莱塔派出工头找到CI的成员，让后者组织代表团，但是工头们认为还没有到将刚刚成功组建

的 CI 和不断增长的利润一道弃之不顾的时候：之后老板直接派工头们去见罢工工人，这样他们就能把代表团选出来；接下了差事的工头们亲自挑选了几名工人，让他们去见管理层，后者告诉这些工人，关于工时的长期谈判将再次开启……

但是，在面对这出工会闹剧时不屈不挠的工人们承认，他们自己反资本主义和反官僚的斗争带有特殊性：第二天，也就是 10 月 16 日周二，第 4 车间的罢工进一步扩大，演变成影响到了菲亚特其他工厂的野猫罢工。工人们在没有提前发出警告的情况下就关闭了第 3 车间的一部分，并将消息传给了第 2 车间的各个轮班，包括质量控制和叉车司机；在位于斯图拉的菲亚特 OSA，工人们出其不意地停止了三个轮班的工作，并在所有部门出其不意地展开罢工（例如在菲亚特灵格托工厂，很多车间的工人将车间持续关闭了好几个小时）。仍然没人通知 CI；没有建立组织机构，也没有提出要求；几千名工人在周二以这种方式展开了罢工，他们的经历甚至传到了都灵以外的工人社会中。

工人们拒绝提出要求

在10月15日至16日的罢工中，工人革命意识和意志终于找到了表达方式，那就是拒绝直接向老板提出积极的要求：但是工人们都知道这场罢工所回应的是老板的另外一个凶猛的挑衅，那就是对实际工资展开攻击：通过对动产（Ricchezza Mobile）的扣除，工人工资减少了将近三分之一！再一次，只有当面对老板时，工人态度才变得“不理智”了起来……

为了扩张，老板需要工人的购买力得到提高：这一关键难点在中左翼开始相关计划前就已初露端倪。但是他们的计划无法应对该问题：首先，因为他们放弃了斗争，也不再通过斗争争取实现工资方面的“突飞猛进”；第二（与第一点同等重要），因为工人的斗争导致了成本的提高和生产力的相应下滑：这对那些号召以分享财富代替合作的人来说就确实不那么令人乐观了……但是直到老板比工人在政治上更具有组织性之前，尽管工人们可能因为无法提高自身购买力而暂时陷入困境，但是坚持一般化的、不可修改的工资要求还是会造成严重的暂时性劣势，老板可能通过大型的改良主义组织机构来回避这一要求。事实上，就连工会分子们都反对“冻结工资”的做法，以至于

他们开始支持同一批工人采取“提高成本”的战术了，因为这可激励人们对创新和结构性改革进行投入……同样地，工人们选择了这条路径（变成了通过“非合作”来缩短工作日），因为这让他们始终将斗争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由于斗争情绪的高涨，1960年以后菲亚特的工人们从“外部”经验中学习到了如何“挑衅性地”利用工会在合同式平台所提出更高的、具有煽动性的要求：时机—工资—人员—工时，所有内容，立刻进行（tutti e subito）；例如，在将“时机”同拒绝接受激励措施和计件工作联合起来的过程中，工人不再让工会在罢工中扮演任何指挥角色……（在6月的罢工中，“要求主义”的整个立场，连同合同工会主义的维度，都暂时崩溃了）。

6月以后，联合起来的工人使老板面临着瓶颈，这迫使老板向工会就显然不在合同之内的内容请求真正的停战，早在1962年秋季来自于工人的压力就已经大到足以迫使工会不顾一切地重新提出相同的内容，以试图疏解施加在“工厂工会……”之上的压力。

1963年夏季，情况出现了反转。焦头烂额的老板派其走卒四处试探工人们的意向，并得到了明确的答复：“从你那里，我们什么也不要。”工人们只奋力争取自己的政治组织：今天是老板被迫对工人发起挑衅，试图通过更高的条

件笼络工人，但是工人们的回应却让他们碰了一鼻子的灰……

10月15日至16日的罢工调动起了^[10]所有的灵活策略，因为工人们的回应成功地从“非合作”中恢复了过来，而非合作本身已经成了一种“政治”回应，即对老板的“政治”目标进行反驳。工人经济水平的提升甚至对于那些政治上联合在一起的工人们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然而，稳定下来的“劳动分工”却反映了阶级的分裂。满足了的要求和经济增长让工人们不再与工会进行对话，这种对话现在却反过来（由工会）再次向工人们提出：但是工人们自己坚持革命性政治组织的视角。

10月16日，对于工人拒绝提出要求的回复，工会做出了回应，在CI内部达成“团体”一致表决，让整个事情变得好像如通常一样合规的拒绝，并重新开启了长期谈判、立法改革和市民的民主游行（“家庭主妇”和“商店主”站在前列）以抗议“生活成本”（的上涨），就好像这就是工人们提出的要求一样。不出一个月后，局势变得更加明朗了，工人们在菲亚特的阿利塔利亚工厂展开了另一场毫无前兆的罢工：这是一座位置偏僻、经常被忽略的工厂……

不满情绪一直弥漫开来，老板通过在评奖时的区别对待进一步火上浇油，老板打算通过“职业性”的利己主义

来保护自己……11月14日上午，工人们一进厂就关闭了加工机械和测量部门：两个小时后，一些工人开始通过仓库传播罢工的消息，板材加工负责人听到消息后也停止了作业：这场罢工没有代表，也没人通知 CI。只有当（部门的）负责人被迫走上前询问工人的要求时，工人才提出要求，挑衅性地提出每小时增加五十里拉，“如往常一样适用于所有人并立即生效”，工人们十分清楚工厂没有可能满足这一要求，他们也清楚，通过提出这一方案，他们不仅摧毁了“政治性”的偏见，还摧毁了工会通过工资合理化而参与斗争的努力。让 CI 介入的其实是管理层，CI 在介入时甚至还不知道已经发生了罢工。工会和老板一唱一和，却仍然完全没能进入工人的斗争之中：对于工会来说，工人们只给了一个多小时来（让老板）实现五十里拉的加薪，因为一旦时间到了而工人们又没得到五十里拉，他们将继续罢工，不再理会再次启动的、充满波折的谈判，这次谈判在“所有层面”上都出现了分裂：因为“部门”谈判属于关于工时的一般性谈判，所以第 12 车间又复工了，关于工人要求的辩论在第二天的报纸上被大肆宣传，但是毫不气馁的工人第二天继续罢工，整个上午工人们都没有提出任何要求，而将这一阵地甩给了老板和工会：正是这一点才是斗争在与“外界”进行交流中真正重要的东西。

通过斗争进行交流

这场罢工是工人的政治联合和政治能力通过发起斗争而进行快速传播的又一个范例，在一般的层面上，工人们与此相关的政治经验确实得到了增加，可以把工厂“内”“外”的整个社会构成利用起来。

在自己将斗争的核心联系在一起、以及将物质联系的渠道和形式稳定下来、还有组织大规模的互助纠察队、或在约定的时间在广场集会等几个方面，工人们学习的很好。今天他们提出的问题是，在政治上和主观上将斗争统一起来的问题。

菲亚特阿利塔利亚工厂的工人甚至在《野猫》报纸还未在本部门传阅时就已经清楚地知道了这份报纸的存在。米其林（不同的公司，不同的行业）的工人同时也知道《野猫》的存在，并发起了意大利化学和石油工人联合会的工会罢工。

工会确信它完全有能力进入米其林这种一般的“工会主义”机构中，因为工会证实米其林公司已经发生了两场“自发”罢工，罢工显示出公司内部存在很大的压力。所

以工会的行动仅限于（通过小册子问卷调查）询问工人现在更倾向于推动哪种形式的“联合”斗争（……但是事实上，问卷不怀好意地向工人们暗示应该选“好利获得公司的模式”……）。显然大多数工人都没去参加“工会化的”罢工（如他们所说）：那些可能参与罢工的人是不会组织纠察队的，是不会宣布与参与纠察队的人和平相处的……双方都认为无法取得经济收益。双方有着同样的斗争意志，都与菲亚特的工人或蓝旗亚的工人进行了一样的讨论，涉及工人超越部门维度、展开斗争的必要性，以便采取更具决定性的举措，让革命性政治组织的前景更清晰。

这一过程甚至包括位于伊夫雷亚的那家著名的好利获得公司的“表达斗争”，好利获得无疑是唯一一家尚未明确否认与工会存在关系的大公司：甚至是在这里，“年轻人”还是轻而易举地绕过了工会的表达形式和截止日期。他们对工会关于将计件工作进行合理化的要求完全不感兴趣，却对老板有着极大的政治关切，这是由于就算他们“脱离控制”，变得不可掌控，以至于为了保住脸面，工会被迫在其措辞的外面披上“野猫”的外衣……这种发生在好利获得的、趋向于解体的趋势，使得三百名“教练”（即拒不参加罢工的顶班者，他们专门为他人设定时间）都与其他人一起自发地展开罢工：这是一种在老板的控制之外

实现了相当程度政治联合的标志，以至于不得不将其保密。

工人斗争在网络节点^[11]上最大程度地激发了政治潜力，政治经验的最大程度集中有助于工人的最大程度集中，并在公开斗争中以极大的强度进行筛选和发展：从此，这种节点的激增就像一股浪潮一样在整个网络中重新启动了逐渐统一和政治成长的运动。一般斗争的浪潮可由化学工人的合同罢工引发，然而却无法像那些漂亮的彩色贝壳那样提出革命性政治组织的最终模式：但是这可以说是向前方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因此，有道理去断定一般情况可能还未积累起足够的势能以吸引菲亚特的工人加入进来以确保（这一局势），并发动新的大规模罢工：事实上，即使是在菲亚特开展野猫罢工，也有助于提高整个运动的政治性。

但是工人自觉意识提出的问题涉及过程的指导问题，以及通过大众的先锋来加速这一过程的问题，这些问题根据的是在一般政治权力斗争中进行改变的战略。在野猫罢工之上开展长期斗争最需要的是远见、理论、组织、战略上的“超越”，只有这样然后才需要在革命政治斗争的国际组织上的“超越”；否则，就算已经提出了对特殊性和劳动过程的“超越”，工人们自我表达的自觉意识实际上也远远无法“超越”到什么地方去。

菲亚特显示出的迹象虽然有限，却将是首次出现可能真正“独立于”资本积累的政治组织形式，因此可以认为这种组织形式能够扮演起在战略上指导工人阶级政治运动的角色。在菲亚特，就像在整个意大利工人阶级中一样，工人们已经目睹了最后的战役：今天，在对集合起来的老板进行反驳的“特殊性”中，我们找到了拒绝工人要求主义和拒绝阶级合作的新的战术应用。我们已经在朝着充分利用这些武器的方向发展，将把它当做革命性决裂的战略武器加以使用。

马 新 译

Karl Yanx 校

[注释]

[1] 阿尔科蒂在全文中对野猫加引号，但我没有再加引号，一是为了保证阅读的方便，二是因为跟很多直接引自于工人或引自于老板、工会和政党标语 / 口号的术语有所不同，野猫这一术语已经众所周知。——英译者注，下同

[2] 这是两位意大利的政治家。乔治·拉·玛尔法在 1962 年任预算

部长，期间推出了涉及意大利经济中由来已久的不平等现象的报告，并试图通过规划将其合理化。该报告是“新资本主义”架构下中左翼经济改革举措的标志性文件，拉·玛尔法因此受到意大利产业总会的抨击；布鲁诺·特伦廷以前是游击队员，后成为意共的政治家，金属制造工人工会和意大利劳工总联盟总书记。

[3] 这里是在回应该时期的术语“自我管理”(autogestione)。

[4] 阿尔科蒂使用的是 *ordinovistico*，在他的著作中，该词属于更少见更生动的措辞。这个术语起源于1919年开始发行的《新秩序》周报，由葛兰西、安吉洛·塔斯卡和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后成为意共领导人）主编。其立场是委员会式的左翼共产主义，认为工厂委员会可以形成基本单元，以朝着革命的方向发展。博尔迪加将这种立场视为工联主义，几年后葛兰西也放弃了这一立场。阿尔科蒂对该词的使用是对战后发展计划的奇怪反讽式置换，这些计划欲将内部异见、工人知识和劳动的社会化统统资本化。

[5] 这一动词在本文和阿尔科蒂的其他文章中多次出现，指的是力量或强制，但也有约束的意思：约束老板，限制老板的选择直到老板被迫采取唯一可行的路径。

[6] 请见我对一篇深入探讨这种“违反”的文章的介绍。文中讨论了“违反”对特龙蒂和潘齐耶里关于机械、资本发展与工人认识之间关系的理解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7] 见注 [4]。

[8] 这里出现了一个关键的区别：资本及其调解人（工会、CI 等）的一方坚持并依靠斗争（单数）的团结性，而工人和社会的对抗方则依靠斗争（复数）“延续性”的联合，这种联合既不能被控制也不能被当成是事实上的团结性。

[9] 维托里奥·瓦莱塔（Vittorio Valletta），1946 至 1966 年担任菲亚特的董事长。

[10] 请见我对一篇探讨阿尔科蒂异常喜欢使用动词 bruciare 的文章的介绍。bruciare 的意思是燃烧、点燃、使着火，该词的使用让阿尔科蒂极具技术性的文章带上了反叛的味道。。

[11] 在阿尔科蒂的晚期著作中，Network（网络）概念出现的频率更高；这个概念首次出现是在 1967 年一次关于阶级构成的研讨会上。

列宁在英格兰

马里奥·特龙蒂

Lenin in Inghilterra

Mario Tronti

发表于《工人阶级》第一期，1964年。

阶级斗争的新时代已经拉开了序幕。工人们通过在工厂里建立有组织力量这一暴力的现实，将新时代强加于资本家们的头上。但资本的力量似乎也稳固而坚实。……力量的平衡似乎是不利于工人……然而恰恰在资本的力量显得最占优势的地方，我们看到有种威胁深深地渗入其中，那就是工人阶级的威胁。

它并不显见。我们要学习，要长远而仔细地看待工人阶级的阶级状况。资本主义社会有它的发展规律：经济学家发现了它们，政府施行了它们，工人也遭受了它们的折磨。但谁能揭示工人阶级的发展规律呢？资本有它的历史，它的历史学家将其记录了下来，但谁会写下工人阶级的历史呢？资本主义的剥削可以通过花样繁多的形式来将其政治支配强加于人，但是日后当工人成为统治阶级时，我们怎样去梳理未来将要采取的专政形式呢？这就是一堆炸药，是剧烈的社会运动；我们必须让它鲜活起来，从内部耐心地精耕细作。

我们曾经有这样的观念，那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第一，工人第二。而这是错误的。现在，我们必须扭转局面，翻转两极，从头开始，重新来过——这里的“头”就是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在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阶段，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得依附于工人阶级的斗争；它落后于工人阶级的斗争，而且他们所设置的、资本再生产的政治机制也必须被推翻。

这不是嘴上功夫，也不只是为了恢复我们的信心。当然，我们迫切需要摆脱几十年来工人阶级不断失败的挫折感，这些失败拖垮了这个起源于本时代的、仅有的革命运动。但是，迫切的现实需要，决不是一个科学论断的充分条件：这个论断必须有自己的立足点，必须站在物质、历史事实的坚实而复杂的基础上。在这一点上，我们的例子将得到证明：在1848年6月（这是个重要的月份，已被资产阶级诅咒了成千上万次的月份），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工人阶级接管了舞台，从此就没有离开过。在不同的时期，他们自愿地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员、题词员、技术人员或置景工，随时准备精神饱满地进入剧场并对观众嬉笑怒骂。那么，在当代舞台上，工人阶级如今是如何展现自己的呢？

我们新的演出方式立足于如下命题：在国内和国际两

个层面上，工人阶级具体、现实的政治地位都必须要实现（necessitate）并指导资本主义发展的既定形式。从现在开始，我们必须对全球社会关系网络有一个新的认识。

比如，在发现这个关系网络的基本物质特征，即发现世界市场正在经历重建时，我们可以在这一过程中追溯到斯大林主义对发展的束缚的终结。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是很容易的，只说成是“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市场问题”即可。但是我们试图给工人阶级的观点找到一个政治解释。今天，统一世界市场的意义在于它带来了社会劳动力的国际水平的控制。在有限的自由贸易区内组织商品生产成为了可能，虽然这并不容易。但工人阶级的动向却不是如此。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工人的劳动力在全球层面已经同质化，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它也将迫使资本同样地变得同质化。看如今，正是工人阶级在世界层面上的运动的统一性，才倒逼资本急切地做出统一的反应以资补救。

但是，当我们说国际工人阶级的运动是统一的时，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呢？官方劳工运动多层的制度结构只会在所有事务中制造分歧，而资本主义的结构又统一了一切——但是这种统一只体现在资本的利益之中。某个政治斗争行为不能简单地用经验手段来检验和衡量。证明这种统一性的唯一方法是着手对它进行组织。那么我们会发现，

阶级统一的新形式完全内含于工人阶级斗争的新形式之中，而这个斗争的领域就是国际层面上的社会资本。

在国际层面上，工人阶级的政治处境从未如此清晰：历史上，无论我们在何处发现了集中的作为产业劳动力的社会群众，我们都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同样的集体态度，相同的基本实践和统一的政治成长。有计划的不合作，有组织的消极态度，对未来议论纷纷的观望作风，政治上的拒绝，以及斗争的永久连续性——这些是当今工人阶级斗争正在对自身进行总结和发展的具体历史形式。然而他们只是过渡形势下的过渡形式，从社会角度来讲，工人已经超越了旧的组织，但还处于一个政治组织的真空之中、尚未成为一个新的改良或革命的政治组织。我们走到了工人阶级史上的一个中间地带：我们必须深入研究，把握其意义，因为它的政治结果将是有决定性的。

不出意外的话，第一个结果就是一个难题：在缺乏与运动水平相适应的制度的情况下，即缺乏阶级自觉通常来自我表达的渠道时，我们如何把握实质意义上的阶级运动？这显然需要更多的理论尝试（还需要更强的抽象概括能力），但这种尝试也有更清晰的实用功能：因为我们不得不独立于工人阶级运动来分析工人阶级。

第二个结果是，我们发现了阶级运动中看上去存在矛

盾和不确定性。很显然，如果工人阶级有某个革命的政治组织，它就会利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一切最成熟的节点。如果伴随着革命成长的不仅有阶级人群的增多，还有该阶级组织的壮大，那在国际水平上建立资本一体化的过程才能成为工人阶级政治重组的物质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对革命是一个有利的战略契机）。如果这个因素不存在，那么整个过程就只有资本得利，而这个阶段也只会成为资本主义体系单方面加强稳定的战术契机，甚至在表面上将工人阶级整合到现有体系中去。

历史上意大利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即天主教徒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有机政治协议，也许会沿着经典路线再次开启一段革命进程。如果能够再次设法为意大利工人提供一个工人阶级政党，那么这个政党将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民主阶段致力于直接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没有这个党，资产阶级剥削的主导地位目前将会变得更加稳定，工人们也将不得不寻求其他的革命道路。这个时候，虽然工人阶级确实客观地强迫资产阶级做出更加清楚、明确的选择，但资产阶级随后确实也做出了反对工人阶级的其他选择。资产阶级在这个时候比工人阶级组织得更好：工人阶级迫使资产阶级接受的选择，可能恰恰有给资产阶级增加实力的风险。这让工人阶级为了切身利益而反对这些选择。

如今，工人阶级的战略观是如此清晰，以至于我们怀疑我们的战略是否到现在才完全成熟（而非更早）。工人阶级发现（或重新发现）了真正的秘密，这是对阶级敌人的死亡宣告：那就是强迫资本转向改良主义的政治能力；然后开诚布公地利用改良主义来进行工人阶级革命。但是，目前的工人阶级的战术地位只是一个没有自己组织的阶级，而且处于一种不那么明确，更微妙而模糊的地位。工人阶级仍不得不利用资产阶级改良中产生危机的各种矛盾，他们必须为阻碍和遏制有助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提供助力，因为工人们认识和觉察到，在没有工人阶级政治组织的情况下，若允许资产阶级改良派随意进行改良，就等于长期冻结整个革命进程（更进一步的说，如果工人的政治组织确已存在，它将立即欢迎改良的发生）。因此，资本和劳工运动这两种改良主义必然会合流，但只能通过工人阶级直接的主动行动才能实现。而现在，所有的主动权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工人眼下的利益就是把这两种改良主义分离开来。同样地，从策略的角度来看，只有当工人阶级经历过抗争乃至革命，而且在革命斗争中历练了组织的可行模式后，这两种改良的合流才会发生。在那时，劳工运动中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与无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历史性碰撞，才真正标志着革命进程的开端。但是我们现在的情

况并非如此，当前的处境是为后面的阶段铺平和引领道路。紧随其后的将是工人们对本国发展总体上的战略支持（即推动资本主义发展到寻求改良的阶段），以及对这种发展的特定形式的（即资产阶级主导的形式）战术反对。所以，今天的工人阶级在战术和战略上是矛盾的。

换句话说，战术的政治契机和战略的理论契机是矛盾的，它们在革命组织和工人阶级科学理论之间那复杂而又相互调和的关系中是矛盾的。今天，在理论层面上，工人视野必须抛弃束缚，它不能局限于自身，要通过超越和否定懦弱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直絮絮叨叨地索要的一切经验证据来实现飞跃。对工人阶级思潮而言，发现的时刻再次降临了。制度建设，反复说教和庸俗论调被提升为系统论述的时代已经彻底过去了，现在需要的是用严格的、单方面的阶级逻辑重新开始，把勇气和决心留给自己，把讥讽留给别人吧。

这不应该与政治计划的创制相混淆，我们必须抵制把这种理论观点直接带上政治斗争舞台上的诱惑。这种斗争是在确切内容的基础上提出的，这个基础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与我们的理论陈述相矛盾。在工人涉及到的既定阶级状况之内，关于直接斗争的实际问题，还有对直接干预的组织的实际解决方法，首先要看这个运动需要什么样的

自我发展，其次才是在普遍视野之下的审视，这样的普遍视野就是要在主观上给阶级敌人制造麻烦。

但是理论与政治的分离只是战术与战略矛盾的结果。在阶级和阶级的历史组织——“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中，两者都有其物质基础，在这个过程里（还在慢慢发展）它们先是分裂，然后相互抵消。这具体是什么意思呢，这样的过程会把我们带往何处？首先要说的是，这条道路的目标是重写两个契机之间正确的政治关系。它们之间的一切分裂在理论上都是不合理的，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起到哪怕是暂时的对立。如果工人运动的一部分再次找到了由工人阶级认可的、通往革命的道路，那么这两个契机统一起来的过程就会更容易，更快捷，更直接，更有把握。否则，即使革命进程会更稳妥，但也将模糊不清，拖泥带水，长路漫漫且富有变数。很容易看到旧有的组织在新的工人阶级斗争中所做的秘密工作。但工人们持续自觉地利用这种旧组织的方法会变得更难掌握，而资产阶级仍相信这制度将会是有组织工人运动所采取的方式。

特别要指出的是，工人阶级在传统组织的指挥下抛弃了所有的战术问题，同时又保持了自主的战略视角，不受限制也绝不调和。而如今我们又有了革命战略和改良战术的暂时调和。即使如此，情况看来也正如时常有之的那样

恰恰相反。现在看来，工人与制度是和谐的，只是偶尔与后者发生摩擦，但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布尔乔亚”表象。事实上，在政治上，即使是工会的小规模冲突也只代表着工人在权力斗争中的理论演练而已：他们接纳工人们、利用工人，一旦工人们被利用完了，就把工人们重新交给老板。事实上，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论点，即工会把握战术契机，而党把握战略契机，对于工人来说依然如此。这就是为什么如果工人阶级和工会之间还存在着联系，工人阶级和党之间就没有关联。正是从直接组织任务中剥离了战略视野的这种现实，暂时地撕裂了阶级斗争和阶级的组织，撕裂了正在进行的斗争契机和临时组织形式之间的关系——这一切都是社会主义改良运动历史失败的后果，也是工人阶级革命的政治发展的现有条件。

理论研究和政治工作实践必须关注这个问题，如果需要的话还当强迫相关的人去关注它：我们关注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革命的发展。我们没有模型，过去的历史经验只能用来使我们摆脱这些经验。我们必须依托于一种新的科学解释。我们知道，整个发展过程实质上体现在工人阶级斗争的新层次上。因此，我们的出发点可能在于揭露某种形式的工人阶级斗争，这种斗争将开启某种向革命方向发展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类型。那么我们会考虑如何

在工人阶级内部传播这些经验，主动选择攻击可能打击到资本主义生产的神经节点。在这个基础上反复进行实验，我们就可以解决如何建立劳资关系，如何创造一个可以与斗争相适应的新的和不断发展的组织的问题。那么也许我们会发现，“组织奇迹”在过去和现在都一直在上演，一直在工人阶级惊人的斗争中发生。就算没有人愿意了解它，但也许工人阶级的一切正在创造和已经创造的革命伟业，比殖民地人民所做的一切革命还要多。

但是，这种实践工作是在工厂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然后就要在整个社会生产关系中起作用，这项工作需要不断地以一种可以将其普及的政治层面来进行评判和协调。这是一种新的政治层面，它需要我们研究和组织新形式的工人阶级报刊。这样的报纸并不旨在立即报道和反映所有个别的斗争经历，相反，它的任务是把这些经验集中到一个普遍的政治方针上。从这个意义上讲，报刊将对斗争中个例的战略有效性进行监测。进行这种监测的正式程序将会完全改变。政治路线必须验证特定斗争的正确性，而不是相反。因为，在这个基础上，政治路线将是工人阶级、也是对当前真实情况的总观点。我们很容易看到，以“一个布尔什维克的阶级组织和党派被认为是集体的组织者”为基础的、或者以此种预期为基础的路线是如何使我们与列

宁主义的工人阶级报纸设想渐行渐远的。在阶级斗争的这个阶段，对我们来说，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我们必须致力的不是先锋队的先进政治组织，而是由工人阶级形成的、团结全面的社会群众的政治组织，在政治高度成熟的时期，正是因为这些特点，这个阶级才是唯一光荣的、有威慑力的革命力量，而正是这种力量控制着现在的秩序。

我们知道这些，而列宁早已知道这些。况且在列宁之前，马克思也以他自己的经验发现——最难的一点就是向组织过渡。斗争的连续性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工人只需要他们自己以及面对他们的老板。但组织的连续性是一个罕有而复杂的东西：一旦组织被制度化为一种形式，就会立即被资本主义（或代表资本主义的工人运动）利用。这就解释了以下事实——工人们都会迅速削弱他们刚刚赢得的组织形式。为了取代一般政治组织的官僚作风，他们用工厂一级的斗争作为替代品，这是一种只有通过生产劳动的智力活动才能发现的新形式的斗争。除非直接由工人阶级构成的政治组织得到普及，否则革命的进程就不会开启：工人们知道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在正式党派的圣堂里高唱“民主”革命的赞美诗的原因。工人阶级的现实与卡尔·马克思的名字是牢牢地联系在一起的，而对工人阶级政治组织的需要与列宁的名字同样牢固地联系在一

起。列宁主义的战略以精湛的笔法把马克思带到了圣彼得堡，只有工人阶级的观点才能迈出大胆的革命性步伐。现在让我们试着以同样的科学冒险精神和政治发现精神来回归到这条道路吧。我们所说的“列宁在英格兰”是一个研究工人阶级政党的、新的马克思主义实践的计划，这就是工人阶级政治发展最高层次上的斗争和组织的主题。

郑 鼎 译

编后记

我们分三卷编选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的“工人主义”流派（operaismo）及其女权批判的核心文本，它们都来自阶级斗争和政治论战在意大利蓬勃发展的 1960 和 1970 年代，而且是首次翻译成汉语。

第一卷开篇是对当年曾参与工人主义团体论战的费鲁乔·甘比诺的访谈（2018），接着是他的学生圭多·博里奥特意为我们编写的意大利六七十年代阶级斗争及工人主义大事年表，这能为读者导航，有助于理解之后的一系列经典作品。第一篇是拉涅罗·潘齐耶里的《机器的资本主义运用》（1961），其中质疑了正统马克思主义对技术的“中立”性和“社会主义”运用的理解；第二篇是罗马诺·阿尔夸蒂的《菲亚特铸造厂的野猫斗争》（1964），为理解意大利工厂新兴的阶级构成发展了新的概念和工具；最后，马里奥·特龙蒂的《列宁在英格兰》（1964）呼吁从新视角看待资本主义和革命，并要求首先观察工人斗争的发展，

然后再分析争取资本发展的斗争所造成的结果。

第二卷从安东尼奥·奈格里的《计划国家的危机》（1971）开始，这篇文章阐释了国家与资本之间的关系，以及资本对于社会各层面的渗透；《政府做老板 工人也能反》（1972）是意大利国有汽车厂阿尔法·罗密欧的工人“自主大会”撰写的报告，详细记录了该厂1971—1972年的罢工事件；玛丽亚罗莎·达拉·科斯塔的《妇女与社会翻转》（1972）批评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偏重于工资劳动，强调妇女斗争以及（大部分是无工资的）再生产劳动的重要性；西尔维娅·费德里奇的政治小册子《反抗家务劳动的工资》（1974）要求承认妇女劳动，并推崇激进地重新定义性别关系；塞尔焦·博洛尼亚的《作为历史范畴的社会—工厂关系》（1974）对建立一种新型的工人阶级历史编纂学做了探讨。该卷末尾是两个附录，第一个简要地解释了工人主义相关的部分术语，第二个介绍了参与当年斗争和论战的部分个人和团体及其刊物，还有当时意大利的主要工会和政党。读者可以在其中寻求检索第一、二卷中的术语和名词。

第三卷包含了作家南尼·巴莱斯特里尼根据阿尔方索·纳泰拉个人叙述创作的小说《我们全都要》（1971）。

纳泰拉是一名来自南意大利的移民工人，参与了菲亚特汽车厂的野猫罢工。我们截取了最近对阿尔方索·纳泰拉的访谈片段 《“它是我的故事”》（2018）作为附录。



